

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搞好了，那三分之二就会过来。

主席：我們希望搞好，搞成一个象样子的国家。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搞不好，那怎么办？也没有什么。不要性急，不要希望我們在时都能搞好。大概一个省的三分之一搞好，那三分之二不搞也可以。那三分之一动起来，那三分之二也动了。你湖北七十一县，三分之一就是二十四个县，也就好了。

××：但要搞好一个县、一个厂……不付出劳动不行，沒有馬列主义、毛主席的認識論不行……

主席：历来講認識論不联系具体工作，离开具体工作講認識論，那講哲学干什么，有什么用处！

××：有了可以造成……

主席：不是一切人心情舒暢，总有一部分人心情不舒暢，地富反坏不舒暢，四不清干部一定时期也不舒暢，不然他們为什么封鎖？

××：是否杀人？我看还是个別杀……点上一股杀人不利。一杀，面上非要恐慌不可。但不是一个人不杀，什么时候杀也要考虑。

主席：就是要震动。杀多了哩！多了有什么害处？一、以后找他使用，活材料沒有了；二、得罪了他家人，杀父之仇。要杀的先关起来。不可不杀，不可多杀；杀一点，震动，怕震动干什么？就是要震动。还有一条，杀錯了死者不可复生。

××：象天津房越良要杀，也沒有材料可用，家庭……不杀，得罪了广大羣众。

主席：京剧界就发生問題。

××：地富儿子劳动算什么成分？

主席：是社員，当然是农民嘛！你社会主义不讓人家参加，一家独占？

雪峯：貧农、中农也叫社員，这个称呼不能解决成分問題。

总理：一般农民嘛！就叫农民。

主席：你們再爭論爭論嘛！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插話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注：方括号內为陈伯达同志发言的有关内容）

〔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見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說明問題的性質。封建社会就是清官与貪官的問題。《四进士》就是反貪官的嘛！〕

巡撫出朝，地动山搖，可了不起哩！

〔封建时代的清官實質上是假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銀。”清，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階級内容。資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謂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財閥。〕

清朝刘鐸的《老殘游記》中說，清官害人，比貪官害人还厉害。后来一查，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說。

〔内部矛盾那个时代沒有？党内党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此問題。〕

我們黨內至少有兩派，一個是社會主義派，一個是資本主義派。

〔主席強調，要聽各方面的話。好話，壞話，特別是反對的話，要耐心聽。這是工作做的好壞的準則。〕

講話長了怎麼辦？李雪峯同志說的話，講長了打零分。講長了，讓他講長嘛！橫直沒人聽嘛！

〔許多人忘記自己是从那里來的。不能忘本嘛！我這個人不参加革命，頂多是个小學教員、中學教員而已。〕

大官是从小官來的，小官是从老百姓來的。我們都是从老百姓中來的，還是老百姓嘛！“蔣委員長”不姓蔣，姓鄭，叫鄭三發子，河南人氏，只知有母，不知有父，還不是老百姓變的？

〔主席常說，不要自以為是。鄉干部當權，就以為自己的意見對。〕

不要當了權，就是自己的意見對。自以為是，沒有自以為不是的。為什麼要開會？就是意見不一致。一致了開會干什么？

〔不怕官，只怕管嘛！〕

小官怕大官，大官怕洋人。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沒有多的講。這個文件（指二十三條）行不行？

第一條，性質問題，這樣規定可不可以？

有三種提法，前兩種較好，還是第三種較好？常委談過，又跟幾位地方同志談過，認為還是第三種提法較好。

因為，運動的名稱即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四清教育運動，也不是什麼矛盾交錯的教育運動。

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十中全會，搞了一個公報，就是講要搞社會主義，不能搞資本主義。

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單干風”，還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刮的可凶啦！“單干風”，鄧子恢是一位，另外還有幾位。有些同志聽進去了，還有的聽了，不答腔，不回答問題。

搞社會主義，搞了許多年，而有些同志聽了不答腔，不能回答問題。

四、五月間，沒有一個地方同志講形勢好，只有軍隊同志說形勢好，我直接聽到的是許世友、×××，間接聽到的是楊得志、韓先楚。當時是五月，就是說形勢不好，有那么一股空氣。

到六月，我到濟南，有幾位同志說形勢很好。時間隔了一個多月，為什麼變了？五月末割麥，六月割了。

為什麼在北戴河我要講形勢？因為那時有人說，“不包產到戶，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復”。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是一種階級鬥爭。所以，提出“有沒有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

因此，政治局常委覺得，大家討論了也覺得，第三種提法較妥，較為適當，概括了問題的性質。

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陳毅同志說，

他也是当权派，只要你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当你的外交部长。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就是要讲点民主。

天天说要民主，就是不民主。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民主。

军队本来早就有三大民主。堡垒打不开，找士兵、战士、班长开会，大家议，怎么打？办法就出来的。这就是军事民主。

政治民主——三大纪律。

经济民主——伙食，要由战士管伙食。现在还管不管？不能单叫司务长管。连里有两个人：一个文书上士，一个司务长。文书上士叫师爷，搞抄写的，就是搞表报的，可不起了！因为他认识几个字。

好话坏话都要听。好话，爱听，不成问题。问题是坏话。七千人大会上我讲过“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偏要摸”，后来认为那句话不那么文明，改成另一种形式了。老子者，就是劳动人民，下级干部。我们这些人就是不大好摸的，你想揭他的疮疤，疮疤可不容易揭！

正确的话，错话都要听。正确的要听，错了也得听下去。人家批评你批评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你本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责任在批评者，你听着，有什么问题呢？！你不听，那不好。正确的，批评得对的，要听。人家批评错了，那更要听了。还有一个，特别是那些反对你的话，要耐心听。做到这个，比较困难。

要让人家把话说完，这也是有点困难。他讲那么长，水分很多，米很少，是稀饭。我就受过很多次这样的灾难。有

人讲了两个钟头，还没出题目，我问他要我帮他什么忙，他才出题目。×××，在延安，有一次找我谈话，讲了两个钟头不着边际。我问他，你找我谈，要我帮你什么忙？他才出题目。另外，有别的同志，他就是训话，我出题他不答题，我只好听训。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世界上有这种人，专门训人的，对我这种人，他就要训，长篇大论地训。

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宣传者，许多概念联系起来。鼓动者，一个概念一个口号。比如罢工，提出一个口号，简单得很，就叫鼓动。写文章，做报告，长篇大论，叫宣传。贴标语，叫鼓动（专为一种事动员）。

×××发明这个道理，他说讲了两次，一次是五十分，一次是零分，人家不愿意听了嘛！我历来提倡，听讲话，不要鼓掌。不爱听的，可以打瞌睡。你讲的没有味道，他还不如打瞌睡，保养身体，还是保养身体免受这场灾难为好。还有一个办法，看小说。我从前在学校听课时就是这样，这就把教员整倒了。（讲了唸书时的故事）这也可能是我的毛病，也许是因为先生讲的不引入注意，我就看小说，后来发明了打瞌睡。不要说我这个人没有发明，我也有发明。（大家笑）用这种办法，我整了那些不是交谈式，而是训话式的人；整了那些老师，他只爱讲，不能让学生提问题，不是提问题启发学生。上课有了讲义，就不必讲了，让学生去看，再出点题目，让学生讨论。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我就主张不再念的，后来说有些人不识字，还是念好，我让了步，还是念了，也鼓掌了，这种会，鼓掌，我也赞成。

在同志中，不要使人怕。对敌人，要使他怕。在同志中，使人怕，那可不行！使人家怕，总是你有鬼，不然为什

么使人怕你呢？凡是使人怕的，大概是道理少一点。

过去军队里，班长带兵有三个办法：打人、骂人、关禁闭，别无办法。他不搞民主。后来我们说不许打人、骂人，禁闭现在也取消了。逃兵，逃了算了，何必捉？捉回枪毙，岂有此理！人家为什么逃？无非是在你这里过不下去了。跑了算了。如果你要把他捉回来，那就向他承认错误，请他吃顿饭，有猪肉吃，并且对他说，你还想逃，就逃之，不想逃，就蹲下来。不能用打人、骂人、禁闭、捉逃兵的办法。逃兵让他逃，他的积极性已经不高，留他有何用？逃到外国，有什么了不起？！中国那么多人。无非是出去骂我们一顿。骂我们的人多得很。赫鲁晓夫、肯尼迪并不是中国人，他也骂。音乐家付聪，逃到英国去了，我说是好事。这种人留在国内又有何用？

我只讲这两点：一是性质问题，二是工作态度。

关于划阶级问题的指示

（时间不详）

划阶级有必要。坏人虽是少数，但他们占居了要害部门，当了权，这不得了。……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

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要团结，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应当要他们，都要嘛。如果只论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例如马克思也是先学唯心论，后来才学唯物论，才搞出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是他在哲学方面的两个先生。

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查出来，象白銀厂一样，把那些坏人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一些人主要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信任，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有的只是剥削阶级出身，那就要看表现好坏。

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把已经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研究提高为理论，加以宣传，把工人阶级从分散的变成有组织的，从自发的阶级变成自觉的阶级。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之下生活工作，为了吃饭，那么忙，自己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不是工人，但他能看出发展的趋向，经过分析研究，把资产阶级哲学变成无产阶级哲学，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变成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样来教育工人。其实，工人也读不了那么多书，读不了那么多大部头的著作，先进的可能读得多一些。阶级斗争的现象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也说是阶级斗争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把它理论化，系统化了。要斗倒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继承了资本主义的，我自己也是先学地主阶级的，六年读孔夫子的，七年读资产阶级的，共计十三年，那时二十几岁，对马克思根本不知道，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知道马克思，读马克思的书。

《前十条》和《六十条》

为什么能调动人的力量

因为它解决了人民内部的矛盾，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把力量组织起来。人是生产力诸要素的首要因素。人，劳动手段（包括畜力、农具、肥料等），劳动对象，这是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嘛，实行了《六十条》《双十条》，还是原来的那些人、畜、农具、土地等等，但是结果却大不相同了。

（当讲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后，“贫下中农心正，地富心服”）那也不一定。贫下中农心正，以后有可能正，也有可能不正。地富心服，也不一定都服。

（当讲到“小站有个假劳模不劳动，一年得一万五千多工分，二千元。”）那是剥削阶级了，撤职，一定要撤。账目要算清楚，一定要退赔。

还有小霸王之类，也要整。

贪赃枉法，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事情就是这样复杂，没有才怪哩，有个对立面也好。

（当讲到曲阜陈家庄陈玉梅被打下去，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把亩产从三百斤翻到六百斤）还是靠自己更生。事情总是会起变化的，把好的打下去，比如把莫洛托夫打下去，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莫洛托夫上来，又从三百斤翻到六百斤。陈玉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是这么惨。象

陈家庄那样，砍树锯葡萄，把房子里的桌椅都搬掉了，好人上台，又都变了。赫鲁晓夫也要把苏联变成这样砍树锯葡萄，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给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陈玉梅，大寨陈永贵。

不要只看到阴暗面，凡是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百分之十的模范，带动大多数，整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坏人。

有些支部，被不好的老党员霸着。他们有一条顶县委的办法，你知道有多少中央委员，姓甚名谁，答不上来，他就说你问题解决不了。上面的人根本下不去，不了解情况。

听取谷牧、余秋里汇报

计划工作时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一月）

（一九六五年一月谷牧、余秋里同志向主席汇报计划工作，当讲到敢想敢干时）

要敢想敢干，不要乱来，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不要讲了半天，又是设计，又是试制，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有。

（汇报到今年钢可以搞到××万吨时）

不是有一个消息吗，英国人听说我们搞调整、巩固，就害怕了。你不搞冒进，搞质量，搞品种、规格，他就怕了。数量慢慢上去，不要急。

（讲到三线建设时）

三綫建設要抓緊，就是同帝國主義爭時間，同修正主義爭時間。

（汇报到我們的技术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时）

是的，我們要有……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彈，原子彈、氫彈，都要超过。我說过，原子彈响了，人类即使死一半，也还有一半。斯諾同我談話，問我为什么不辟謠，我說不要辟謠。我只說过战争打起来人死一半，还有另外一半。有比我更厉害的，美国的一个影片形容得很厉害呀！赫魯曉夫比我說的多得多嘛！他說有毁灭人类的武器，什么死光。我不是說中国，而是說全世界死三分之一，极而言之，死一半！三綫建設，我們把鋼鐵、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来怎么办？我們就用常规武器跟他們打。从前我們沒有飞机、大炮……又沒有黄色炸藥，还不是打赢了！打起来还可以繼續建設，你打你的，我建設我的。

（講到設計一定要采用新技术时）

設計要做比較，哪些花錢少，办事多，哪些花錢多，办事少。設計人員是在家里設計，还是到現場設計？我看了一万二千吨水压机設計的文章，有些設計經過一次、二次，甚至几百次的失敗，不經過失敗是不会成功的。

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講話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就开会。有的同志說，打开灭战

怎么打法？一个二十八万人的县集中一万八千人，搞了两个月沒打开，学文件就学了四十天，学习那么多天干什么？我看是煩瑣哲学。我不主張那种学习。光看是沒有用。（刘××：河南有几万人集中在几个地方，搞了四十多天，是反右傾，搞清楚一些問題。）（刘子厚：我們集中也是反右傾放包袱。）有成績沒有？文件一天就讀完了，第二天就議，議一个星期就下去。主要是在农村学，向貧下中农学习。我的一个警卫員，二十一岁，他写信來說：“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沒有学懂，这次下来才知道了些东西。”就是学一个礼拜文件，下去就进村，向貧下中农学习嘛！他說还有几怕，一怕死人，怕扎錯根子。怕这个怕那个，那么多怕就不行。二十八万人的县有一千八百个干部，还說少了，要那么多人，我看是人多了。工作队那么多人，你又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县的二十八万人？依靠那里的好人，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个好的，还有二十七个是好的。有二个坏的，还有二十六个是好的。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呢？一万人兩万人搞一两个月还搞不起来。扎根串連，什么扎根串連？冷冷清清，就是沒依靠好，如果依靠好了，一个县十几个八就够了。总而言之，我們从前革命不是那么革的。一兩万人搞一两个小县，傾盆大雨，几个月还搞不起来。以前安源煤矿办工会，……安源工人我們一个都不認識。一去就公开講：有那些人愿意进夜校。开始找到了工头，他有兩個老婆，是否搞了俱乐部？（×××：沒有搞。）搞了三个月，罢工就罢起来了嘛。

我看一进村和羣众見面后，开门見山宣布几条就行了：

一、向社員宣布我們来不是整你們的。还有一部分老实的地富是否也可以宣布，不是整你們的，除了一部分漏划地

富，一部分有严重问题的反革命和投机倒把分子以外，小偷小摸，统统免了。开门见山讲是整我们党的内部，不是整社员。宣布我们来意不是整你们的。你们有什么不对的事你们自己去谈，我们不听你谈。社员中有严重的，极个别的也可以谈谈，这是极少数。

二、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的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有多吃多占的，有多吃多占很少的，也有什么都没有的，几十元的，一百元、二百元以内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经过群众批准就拉倒，也只有这一点嘛！你讲出来没有事了，不讲出来就有些事了。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退赔得好，可以不戴帽子，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继续当干部。

我看进村以后个把月要开个大会，以县为单位开个大会，一个小队来一个小队长，两个贫下中农；一个大队来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公社来书记社长。分几次开，一次开一天就行。先讲来意，话不要讲长，讲半个钟头就顶多了，讲一个钟头大家就不愿听了，让他们下去传达。二十八万人的县，三千多个小队。一个生产队三个人，一万人上下，一次开不起来分两次三次开，一次开一天。开个万人大会，就安民了。这样冷冷清清，搞那么多工作队，几个月搞不开，又没有经验，不会工作的人占大多数。通县去了两万多人搞一年多还没有搞开，有不会工作的，有做官的，我看这样革法，革命要革一百年。工作队里去了一些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书读得愈多愈蠢，啥也不懂，就是这个事，此外没有了。

这样打开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要依靠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个

搞法和我們过去搞法不一样。要几个月歼灭敌人，我看方法要改，不依靠群众，几个月搞不起来，想个办法吧！

你们（指刘子厚、张承先）地委书记李悦农带队，几个月搞不起来，想个办法吧！为什么搞不起来！（刘：是强调扎根串连搞慢了，我在任县是大会小会结合搞的）干部会、贫下中农会可以在大队开，也可以去县里开。去年湖南省开了一个全省的贫下中农代表会，结果不错，今年增产粮食二十亿斤，我看起作用了。那么怕，怕扎错了根子，你鑽到那里头去了？进村要开大会，贫下中农包括漏划的地主和富农统统都来，宣布几条，双十条不要一条一条的那么念。

真正的领导人、好人要在斗争中才能够看出来，光靠访贫问苦看不出来。访贫问苦，我就不相信。一不是亲戚，二不是朋友。粤汉路组织罢工，我在长沙。我们不认识一个人，还不是找了两个工头，一个叫朱绍廉的有两个老婆，他也要革命，因为工头受压迫，工资少，不够用，这个人后来还不是英勇牺牲了。那里是这样的扎根串连的方法？你去发展，去搞群众运动，去领导群众斗争，在斗争中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嘛，然后在斗争中造出自己的领袖来（刘子厚讲了他自己去任县蹲点开斗争会的办法）。这些斗争大会也应该讲去年分配，讲工分，注意生产。南方有，北方没有？有灾救灾，无灾清工分，搞当年分配，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头。四清是清干部，清少数人。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也有清的吧！身上没有虱子，一定要找出虱子来？（刘××：一个高潮一个高潮地来，不能拖延，拖延反而搞不彻底。）一个时期，文件学习四十天，搞烦琐哲学。我跟前那个警卫员来信说：学了四十天文件，仍然不懂，下去蹲了点才懂了。

我历来反对这样讀文件。学文件四十天是迷信。要开大会，搞斗争，搞地县的三级斗争会。

謝富治那个办法值得采取。抽出百分之二十的人来訓練。六千人的工厂总有五千人要依靠，为什么不依靠五千人，只依靠你们工作队的五百人呢？我看有你一个人就行了。一个部长依靠五千人还搞不开？不要糾纏在文件上，訓練那么久？搞斗争嘛。过去我們打仗，一拉起就打。有打胜的，有打败的，什么書也沒有。有人說我帶《三国演义》打仗的，誰照着書来打仗？林总过去打仗是內行，××过去也是內行。××也是內行。內行也好，外行也好，要打才能学会。你不打仗光在那里学，怎么能行？（問謝富治）你們搞了一千多人的訓練班是不是也是学双十条？怎么学？学多久？（答：也学了点，很快就搞斗争了。）为什么不可以大队为中心或以社为中心开訓練班？所謂訓練班就是斗争会，就是要在会上了解情况，了解各种人物，进行調查研究。要把斗争的人斗得差不多了，然后指定个把人作总结。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依靠工农群众。河北省新城县張承先、李悅农当了多少年干部不懂群众运动，那么多人冷冷清清没有搞开。李××是保定地委書記，他首先提出四清，他下去要搞别的，群众要搞四清，他听群众的，……就是一九六二年提出搞四清的保定地委書記李××，原因是那时有个压迫在前面，打仗也好，搞农民运动也好，搞工人运动也好，工厂有资本家，农村有地主豪紳。国民党政治軍事都在压迫着我們，我們无法可想，只好依靠群众。那时党员干部又少，几千人万把人的工厂，一个党员也沒有。有一个就可以搞大革命，搞罢工。粤汉铁路一个党员也沒有，可以搞大罢工。你后来建党嘛。

現在进了城，当了官，就不会搞群众运动了。

为什么过去上軍校的人打起仗来不翻書，黃埔軍校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是正式軍官学生。学生訓練，操一操，練一練，就毕业了。林彪同志說，出来当連長根本不会打仗。班長有經驗，听班長的話。他說怎样就怎样，打上几次就会打了。我不相信学了就会打仗，一个知識分子讀了几年書就会打仗？不会打仗是合乎情理的，打几年就会了。我們工作队是否出了些主意？（刘××：貧下中农的主意多，我們也出一点，主要是群众的。）要听他們的，要听群众的，要听貧下中农的。就是发动群众要革貪污盜竊、投机倒把的命。要搞大的，小的刀下留人。（刘：一个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一个是众群发动起来到一定时候，工作队要掌握住火候，要善于观察形势。何时进攻，何时后退等等）等于罢工一样，什么时候罢工，什么时候复工。打仗也是一样，还是进攻，还是退却，实在不行你不退啊！有时候双方都退。比如打高兴圩，蔣、蔡向贛州退，我們向山溝里退，各退各的。

（問陈伯达）天津开了多大的会？（陈答略）不得了，糟糕！多浪費時間，就不要开嘛！（陈插話：略）一千多戶去那么多工作队，人多展不开，搞人海战术不行。一千多戶你依靠七、八百戶就搞起来了。有一个陈伯达就够了。嫌人少再帶一个去，无非是宣布。我叫陈伯达，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开个会。无罪的是多数人，有罪的是少数人，依靠多数人嘛！

（总理插話：剛才陈毅講張茜学了两个月才进城）越学越蠢。反右傾，結果自己右傾。張茜在哪个县？（×××：句容县。）我历来反对学文件，一个文件几个鐘头就看完了。

你帶下去學嘛。下去一不要學文件，二不要人多，三不要孤立地扎根串連。開會不要長，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要讓羣眾去搞，不相信羣眾，只相信工作隊，不好。我身邊的娃娃學四十天文件還不知道講些什麼，下去才知道。另一個在通縣說教授不懂，助教好一點，學生更好一點。我對孩子講，你讀十幾年書越讀越蠢。什麼也不懂，你向大家說，我二十幾年是靠吃蜜糖長大的，什麼都不懂。請叔叔伯伯大娘指導。還是學生比助教好，助教比教授好。教授書讀得太多了，不然怎麼是教授。這些人下去是阻礙搞四清的。他們的目的是不要搞四清的。

一個是謝富治的經驗，辦訓練班搞鬥爭。一個是河南經驗，“三結合”開鬥爭會。他們搞鬥爭也搞了一個多月四十天。他們不是讀文件，而是搞鬥爭，發動羣眾，了解情況。總而言之，搞鬥爭。（×××：我所在的那個大隊，搞了兩個月，搞出兩萬多元，十萬斤糧食）還是有油水搞，向他們借點錢用，他們的錢多得很，羣眾還是有希望的。照五保戶也好，搞生產也好。會不能開得太小了，有的生產隊十幾戶，十幾二十幾個人，講話打不開情面。一個大隊十幾個生產隊。開大會頂多也是幾百人嘛！

現在搞不起來，其原因就是不開大會，不宣布來意。

從來沒有看到要這麼多人，那麼多人我就不相信能搞好。

總之，要依靠羣眾，不能依靠工作隊。工作隊不了解情況。或者沒有知識，有的做了官，阻礙運動。工作隊本身有的人就不能依靠。現在已擺成這麼個陣綫，一個通縣，一個新城縣。誰叫人少，我就砍一半，再叫人少，再砍一半。通縣二萬人砍一半分到別處去。一個縣有五千人還不行嗎？

（康生插話：扎根串連是鄧老發明的。……）啊，是鄧老發明的！神祕化嘛！不宣布來意。要宣布我們做的事：生產、分配、工分，搞這幾件事。四清講一點，清不清，羣眾討論，有就清，沒有就算了。羣眾的清。開個會要有幾百人，小隊十幾戶人少，以大隊為單位開。說縣里開了會了，講出去可靈哩。縣委書記問題嚴重的，當工作隊到別的縣去。照現在搞法，我看太煩瑣了。你陳伯達那個是一千多戶，開始幾個人也搞開了。以後加下了五百人，要那麼多人幹什麼？

（鄧××插話：講長一點，反對急躁情緒）講五、六年，三、四年，兩、三年完成豈不更好。方法很重要，一個縣集中一萬多人是多了。一九二七年搞農民協會，一個縣一個人，是農民自己搞起來的，沒有好幾個幹部。農業部、財務部、武裝部……七、八個哩，開始都是些勇敢分子，包圍縣的也是那些勇敢分子。要求過分徹底，實際上不能那麼徹底，當派少數人是混進來的，是嚴重的，大多數是能夠爭取改造過來的，還有用處。過分了，羣眾不一定贊成。我們想開一點，可能快，不能那麼太徹底。（劉插話：工廠中要可靠工人占優勢）

工作隊不一定太乾淨，一定要把有問題的人開除出去嗎？不一定。工作隊中可以有貪污投機倒把的人，只要他交待就行。我們這些人對貪污投機倒把沒有知識，沒有經驗，他們有經驗，沒有們他還不行。集中力量打歼滅戰，方向問題沒有解決，如何打法？這樣多人反而搞不開。不如陳伯達的辦法。靠人海戰術不行，要出問題。

王××提出幹部交換問題，從這個縣到那個縣，這個社到那個社。來了新人不摸底，羣眾敢講話。新社長、新書記

来了，就敢講以前的。很快就可以搞开的，为什么要很久？

现在是工作队不要那么纯洁。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没有群众运动。一万多两万多人在一个县还嫌少？（刘××、邓××……）

贫下中农协会就是要把问题搞清楚，跟陶×他们说。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三月）

日本投降了，我们又被迫打仗。打的办法就有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军事道理，简单的就这么两句话。什么叫你打你的？他找我打，但他又找不到，扑了个空。什么叫我打我的？我们集中几个师、几个旅，把他吃掉。

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帝国主义也是事物，也可以分割，也可以一块一块地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也是事物，也可以一块一块地消灭。这就叫作各个击破，这就是欧洲和中国古语里说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不要看書啰，誰打仗还拿本書去看。我打仗从来不看書。少看一点，看多了不好。

战场就是学校，军事学校我不反对，可以办，但不要学得长，一讀兩三年，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什么陆、海、空学校，不怎么高明。

有些现代科学需要长一些时间学，例如导弹、原子弹，

就是講研究和制造。軍用武器的使用法，訓練士兵，不需要很長時間。訓練炮兵一個月就行。訓練駕駛員、飛行員，幾個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戰場上訓練。和平時期要在黑夜里訓練。戰爭時期，戰爭就是學習。你不是說念了我寫的文章嗎？這些東西用處不大，主要是兩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又是兩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帝國主義最怕這種辦法。打得贏我就把你吃掉，打不贏我就走掉，你找也找不着。我們開頭時用游擊戰的辦法，攻的時候用，防禦的時候也用。根本的辦法是打游擊戰。打蔣介石時，從小仗打到大仗。後來我們用三十萬軍隊消滅他五十萬軍隊，我們用三個指頭吃他五個指頭。我們是少數，怎么能吃得掉？怎么吃法呢？還是一個個地吃，結果把它吃掉了。

有些外國人在中國上學，學軍事。我勸他們回去，不要學太長。幾個月就行了，課堂上盡講，沒有什麼用處。回去參加打仗最有用。有些道理只要講點就行了，不講也可以。大多數時間可在本國，或者根本不出國，就可以去那裡。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讀那麼多書。華佗讀的是

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讀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騙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羣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对于一些常見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預防，怎样改进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羣众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檢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傳染給別人？我看主要是怕別人傳染自己。要分別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間的隔閡。

城市里的医院應該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結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同法国事务部长馬尔罗的談話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

主席：馬尔罗先生来了多久了？

馬尔罗：十五、六天了。見了陈毅副总理，到延安等地

去了一次。回来后見了周恩来总理。

主席：喔，你到了延安。

馬尔罗：这次去延安，使我学到很多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况，比过去知道得多，我今天能坐在除了列宁之外当代最偉大的革命家旁边，感到很激动。

主席：你說得太好了。

馬尔罗：我在延安看到了过去艰苦的环境，人們都住在窑洞里，我也看到蔣介石住宅的照片，对比了一下就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主席：这是历史发展的規律，弱者总是能战胜強者的。

馬尔罗：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曾領導过游击队，不过当时的情况不能同你們比。

主席：我听说你打过游击。

馬尔罗：我是在法国中部打过游击，領導农民軍队反对德国。

主席：十八世紀末法国革命推翻了封建統治，当时推翻封建統治的那些力量最初也不是強的，而是弱的。

馬尔罗：这很有意思，农民都没有打过仗，不知如何打，但他們能当很好的战士。拿破侖手下就有很多这样的战士。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領導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們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主席：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們同农民吃一样的飯，穿一样的衣，使战士們感到我們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們調查农村階級关系，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把土地分給农民。

馬尔罗：主席是否認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主席：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

如果不打贏仗，誰聽你的話？打敗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點敗仗，多打一點勝仗。

馬爾羅：在二千多年的歷史中，農民習慣於打敗仗，打勝仗的不多。

主席：我們打過勝仗，也打過敗仗。甚至整個南方根據地都失掉了，跑到北方來。

馬爾羅：儘管如此，但人民對紅軍的懷念仍然存在。

主席：以後在北方建立了很多根據地，發展了軍隊，發展了黨，發展了羣眾組織，北方人民得了土地。我們解放了北京、天津、濟南等大城市。隊伍逐漸擴大到幾百萬，由北方向南方打。要講經驗還有一條，就是在中国要把民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團結起來，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凡是不跟敵人跑的人。我們在一個時期甚至跟大資產階級蔣介石建立了統一戰綫，如果蔣介石不進攻我們，我們也不會進攻他。

馬爾羅：為什麼蔣介石要進攻你們呢？

主席：他想把我們吞掉，他認為他可以。

馬爾羅：他是否認為中國共產黨很弱？

主席：我們有許多根據地，人口占全國五分之一，軍隊有一百萬左右。蔣介石卻不同，他有四百多萬軍隊，有美國的援助，我們的根據地很大，但根據地是分散的，也沒有外部的援助。

馬爾羅：是不是還有一個原因，即蔣介石只相信城市的力量。

主席：他有城市，有外國援助，同時他在農村的人口比我們多。

馬爾羅：我曾去過俄國，曾同高爾基談過這個問題，同他談了毛澤東，那時您還不是主席，高爾基說，中國共產黨最大困難是沒有大城市。當時我問他，沒有大城市是會失敗還是成功？

主席：高爾基回答了你沒有？（馬爾羅搖頭）。他不知道中國的情況，所以不能答复你。

馬爾羅：高爾基常說各地農民都一樣，但我認為每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現在我提一個問題：中國再一次要把中國變成偉大的中國。幾世紀前中國從技術來說是強國，如絲綢，後來歐洲變成技術上先進的國家，有武器、軍火，現在中國也有武器、軍火，又要成為強國了。當然，中國不需要成為歐洲式的強國。中國要變為中國式的強國，不知需要什么東西。

主席：需要時間。

馬爾羅：我們希望你們有你們需要的充裕時間。

主席：至少需要幾十年。我們還需要朋友，例如同你們往來，建立外交關係，這就是朋友的關係。我們有各種朋友，你們就是朋友的一種，同時在北京訪問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主席艾地，也是我們的朋友，我們還沒有見到他，我們同艾地有共同點，同你們也有共同點。

馬爾羅：這些共同點是不一樣的。

主席：有一點是一樣的，例如如何對付美帝國主義，對付英國的兩面派，你們比英國明朗。

馬爾羅：實際上反對美國在越南“逐步升級”的只有法國。

陳毅：英國人支持美國侵略越南，而你們反對。

馬尔罗：英国有馬來西亞問題。

主席：英美倆要交換。

馬尔罗：从戴高乐总统恢复政权后，法国已結束了它的殖民主义立場。每天援助阿尔及利亞几亿法郎，是我亲自去非洲四国宣布他們独立的。在戴高乐总统看来，中、法有一个絕對的共同点，如果有苏、美双重世界霸权，那么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和法国要成为真正的法国是办不到的。

主席：当然啰，一个是你們的盟国，一个是我們的盟国，你們的盟国是美国，对你們是不怀好意的。我們的盟国是苏联，對我們也不怀好意。

馬尔罗：列宁死后，人們談到苏联时就会想起斯大林，斯大林死后，……新大林的制度被推翻了，至少部分被推翻了。但苏联领导人却假說苏联的制度沒有改变，赫魯曉夫就是这样亲自告訴我們的。我認为現在制度不同了，尽管用的詞一样，但是內容很不同了。

主席：他还进一步說要建立共产主义，这是斯大林都沒有說过的。

馬尔罗：我感到赫魯曉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主席：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馬尔罗：他們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主席：苏联想走資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們是不欢迎的。

馬尔罗：难道主席真正認为他們想回到資本主义道路？

主席：是的。

馬尔罗：我認为他們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們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連他們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主席：他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羣众，你們也有自己的經驗，法国社会党难道真搞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真相信馬克思主义？

馬尔罗：法国社会党黨員中只剩下百分之七是工人，其余主要是職員，在这方面他們是強大的，因为有工会，是由職員們組成的。另外，还有些黨員是南方的葡萄种植园主，是地主。至于說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主义者，則是另外一个問題。法国农民的作用同中国的不一样，不只是絕對数少，占人口比例也不及中国。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要起作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知識分子中寻找力量，一是在真正无产者中間寻找力量。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可能在感情上偏向中国，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于中国，因而实际上又偏向于苏联。

主席：他們是反对我們的。

馬尔罗：作为一个党是反对中国的，但工人、知識分子、农民并不反对中国，目前党内冲突很严重，法共就象最懶的人一样，兩面都想应付，你們可能已看到很多这种情况了。

陈毅：他們並沒有应付我們。

主席：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諾夫和孟什維克过去都是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維克，脫离了人民。現在是在布尔什維克本身內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們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問題看我們如何处理。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誰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馬尔罗：現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主席：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

馬尔罗：为什么有作家？

主席：有一部分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的。

佩耶：我有一感觉，中国青年正朝着主席所主张的方向在培养中。

主席：你来了多久了？

佩耶：十四个月了，从广州到北京一路上学了許多东西。以后参加使节旅行，去过华中华南，荣幸的访问了主席的故乡韶山，还到长沙、四川，最近又到东北去了一次，很有意思。我在工厂、公社、街上、戏院都尽量同人民接触，感到青年人没有那些要你们操劳的矛盾。

主席：你看了一个方面的现象，另一方面的现象没有注意到，一个社会不是一个单位，是个复杂的社会，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佩耶：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引导青年，使他们走向你们所指出的方向，矛盾当然还会有，但是方向肯定了。

主席：一定有矛盾。

馬尔罗：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在国内方面。

主席：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

在党外，党内也有。

馬尔罗：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例如举行党代表大会就要确定一个目标。是否是农业问题，因为我感到工业问题已解决了，或起码是走上健全道路了。

主席：工业和农业问题都没有解决。

馬尔罗：我在西安参观了纺织厂。在法国，纺织厂同革命有很大关系，一七八九、一八三〇、一八四〇、一八五一年都是这样，特别在里昂，因为纺织工人是最穷困的。我在西安看到该地的纺织业已达到解放前上海的水平，大部分机器是中国造的，机器多，工人少。显然中国共产党在纺织工业执行它要执行的政策。但相反在农业方面，可耕地很少，使中国政府处境困难。现在农业方面是否考虑发动一次超过人民公社范围的大规模的运动？

主席：人民公社在组织机构和生产关系方面不会有什么改变，在技术方面开始有了改变。

馬尔罗：你考虑可以增加些耕地面积吗？

主席：可以增加一些，主要的还是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作，今天就不多谈了，请回去问候你们的总统。

馬尔罗：关于外交政策的问题，我已同周总理、陈副总理谈过了，不再向主席重复了。今天谈的是戴高乐总统閣下最关心的基本问题。感谢今天的接见，并转达戴高乐总统閣下的问候。（出門时）

主席：我接见过法国議員。

馬尔罗：我最不相信議員的話。

主席：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没有你这样明朗。

馬尔罗：可能是因为我更負有責任的緣故吧。

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論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們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書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給誰看？一些知識分子，什么吳晗啦，翦伯贊啦，越来越不行了。現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贊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对农民的“讓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讓步？地主階級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讓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說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說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認為光緒皇帝是个可憐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軍，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們的总路綫，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賦人权”、“天演論”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賦人权”也是一种錯誤的思想。什么“天賦人权”？还不是“人”賦“人权”。我們这些人的权是天賦的嗎？我們的权是老百姓賦予

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农賦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讓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讓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每当出現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輕徭薄賦”政策对地主階級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請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說：我讀了几年書，腦子連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沒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說道：本質就是主要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話，我也還沒說过。現象是看得見的，刺激人們的感官。本質是看不見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現象背后。只有經過調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質。本質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見，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漸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細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識也好。

現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麦、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見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見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乡去，跟貧下中农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几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师，向你們来学习。”其

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岁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

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象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中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的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有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食、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说法，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腸吸收营养，把

糟粕排泄出来。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弃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大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就是学生腔（陈伯达同志插

话：主席除外），我做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統一嗎？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如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与陈伯达、艾思奇同志的談話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这么多吗？许多事你们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评。每个人都长着眼睛和咀，就应该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说。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咀巴，就要负担两个责任，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话，就要负起斗争的责任来。

没有党的领导，单靠首长个人来领导，事情一定办不好，一定要靠党和同志们来办事，而不是靠个人来办，群众要发动，要形成群众动手动口的风气。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与毛远新的談話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

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六年中先搞三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二年。尖端学科搞三年，要有针对性也许行。三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

有针对性才能有少而精，有针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结合。六年改成三年，这样作以后，步骤稳妥，方向对头。

新事物干它几年，不断总结经验才行。

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读书不行。黄埔军校就读半年，毕业后当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材，改成陆军大学以后结果出来尽打败仗，作我们的俘虏。

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有一个整体。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习近代史。现在才三千年历史，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

尖端理论，包括通过实践证明了的有用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实践证明没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

讲原子物理只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要从丹麦学派波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坂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

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讲心理学，讲神经

系統那些抽象的東西，我看不對，應該先講解剖學。數學本來是從物理模型中抽出來，現在就不會把數學聯系到物理模型來講，反而把它進一步抽象化了。

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指示信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三月十一日信收到了。小計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農業機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並參觀那里自力更生辦機械化的試點，這個意見很好。建議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的時間就可以了。回去後，各作一個五、七、十年計劃的初步草案，醞釀幾個月，然後在大約今年八、九月間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才有可議。若事前無準備，那時議也怕議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區自力更生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方面，對原材料等等方面不足的地區有所幫助，但要由地方出錢購買。也要中央確有材料儲備可以出售的條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則推遲時間，幾年後再說。為此原材料（鋼鐵），工作母機，農業機械，應國家管理。地方製造，超過國家計劃甚遠者（例如超一倍以上者）或超過額內，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讓地方購買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積極性調動不起來。為了農業機械化，多產農、林、牧、副、漁等品種，要為地方爭一部分機械製造權。所謂一部分機械製造權，就是大超額分成權，小超額不在內。一切統一於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辦法。又此事應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

系起來，否則地方有條件也不會熱心去做。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到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備，依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遠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局部地區的災荒，無論那一個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看，就更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于擴大再生產著想。所以農業機械化再同這几方面聯系起來，才能動員羣眾，為較快地但是穩步地實現這種計劃而奮鬥。蘇聯的農業政策，歷來就有錯誤，竭澤而漁，脫離羣眾，以至造成現在的困境，主要是長期陷在單純再生產坑內，一遇荒年，連單純再生產也保不住。我們也有過几年竭澤而漁（高征購）和很多地區荒年保不住單純再生產的經驗，總應引以為戒吧。現在雖只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是最好地同時為國家的辦法，還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老話）的口號，究竟能否持久地認真地實行，我看還是一個問題，要待將來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夠解決。蘇聯的農業不是基本上機械化了嗎？是何原因至今陷於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幾點意見是否可行，請予酌定。又小計委何人去湖北，擬以余秋里、林××二同志為宜。如果讓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也派人去的話，各省擬以管農業書記一人，計委一人去為宜，總共大約七十人左右去那里，開一個七天至十天現場會，是否可行，並請斟酌。

在政治局扩大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

一、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問題

苏联“二十三大”我們不参加了。苏联在內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們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帶水。要人家不动搖，首先要自己不动搖。我們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間派向我們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行就是筆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們講过叛徒、工賊，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們，我們就有文章可作了。叛徒、工賊总是要反华的。我們旗帜要鮮明，不要拖泥帶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有人問：这次我們沒参加，將來修正主义开会，我們发不发賀电？)发还要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問題、教育界問題

我們被蒙在鼓里，許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們对民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區別于买办資產階級的。應該把他們區別开，區別政策是很灵的。如果把他們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現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农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壟断了。解放后，我們把他們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現在搞学术批判，也要保护几个，如郭老、范老(文瀾)，也是帝王

將相派。現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經研究部門。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門門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沒有一門沒有史。对自然科学这門，我們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評一下，講講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們手里。对自然科学，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看法也不一样，唯心論和唯物論也都牽涉到自然科学問題。范老对帝王將相很感兴趣。这些人，有的是帝王派，对帝王將相，很感兴趣，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林彪：这是階級斗争。)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階級斗争，不然將要出修正主义，將來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吳晗、翦伯贊都是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們倆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却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論。(林彪：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建設。)这是一场广泛的階級斗争。現在全国二十八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沒有动。

对知識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長，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林彪：报纸要抓，报纸是一件大事，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还有那个北京刊物《前綫》，实际上是吳晗、邓拓、廖沫沙他們的前綫，有个“三家村”就是他們办的。廖是为“李慧娘”捧过場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論”。階級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請各大局、省委注意一下，如学术、报纸、出版、文艺、电影、戏剧等，各方面都要管。

××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是历史所長，他是赵××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

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纲、翦伯赞，反正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

（××：文艺界，医务界都组织工作队下乡）

他们都下乡好，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尽读古文书不行，要接触实际。×××写不出好东西来。学文学不要从古文学起，包括鲁迅、我的，要学写。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学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写就行，以后以写为主，就象外文以学听、说为主一样。写等于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写为主。至于学史，到工作时再说，我们部队的人，那些将军、师长，什么堯舜皇帝都不知道，孙子兵法也没学过，不一样打仗？《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它那样打的。（林彪：书本上那么多条条，到时候也找不到那一条，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一样的，还是简单一些，按实际情况办事。）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就象×××的批判罗尔纲，×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不要怕触动罗尔纲、翦伯赞，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彭×：实际是他们专政，领导权在他们手里，你反对他，他就扣你工分。）把学生、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其余的一部分人能改就好，不改就拉倒。

（彭×：搞主义不能合作。）（林彪：这是阶级斗争，他们要讲话的。）还是××讲得对。××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朱×：打倒那些权威。）

（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他死，他就夭折了。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这个问题很大。

三、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嘛？（彭×：中央和地方要象野战军和地方军一样。）在南京，我和江××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軍、空軍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武装斗争。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

（刘××：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周总理：要搞机械化。）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周

总理：怕說他們是分散主义。）地方要抓积累，現在是一切归国庫。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資金，二有原料，三有設備。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澤而漁，苏联就是吃竭澤而漁的亏。（彭×：上海用机器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是非法，要承認合法的，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凱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現在反动的就是不讓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虛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是虛君共和。中央还是虛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針，就是大政方針也是从地方鳴放出来的，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虛，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們出中央，到地方上去，連人帶馬都出去。（彭×：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就是工业党。）四清都归你們，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政治部，你們有什么經驗？軍隊还是靠地方軍，以后才变成正規軍的。我没有什么經驗，过去三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給个精神，中央沒有一粒子彈，一粒粮食，出一点精神。現在是南粮北調、北煤南調，这样不行。（周总理：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下放，不是上調，中央只管尖端）飞机厂也沒有搬家，打起仗来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一个小鋼鐵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鋼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帶三新，老厂帶新厂，老基地帶新基地……。）（林：老帶新，这是中国道路。）这好象抗战时

期那个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彭×：小鋼鐵厂有××个，給中央統光了。）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統統归他們。（彭×：明年搞个办法。）等明年干什么？你們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周总理：現在搞农机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那就叫八机部的×××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苦，江西一担粮收税（送去）三回，我看應該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許打。

中央計劃要和地方結合起来，中央不管死，省也不能統死。（刘××：把計劃撥出一点归地方。）你用战争能吓唬他，原子彈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嗎？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澤而漁，現在是上面无人管，下边无权管。（陶×：中央也无权呀！）現在准許鬧独立性，向官僚主义要独立性，要象×××那样。学生也要鬧，要鳴放学术問題。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講稿給学生讀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問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牆脚。吳晗、翦伯贊就是靠史吃飯的。俞平伯一点學問也沒有。（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不要学翦伯贊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釋、只記錄，不要受束縛。列宁就不受馬克思的束縛。（林彪：列宁也是超，我們現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主席思想的种子。）那这样說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縛，要有新解釋，新观点，要有新的創造。

就是要教授給学生打倒。（林彪：这些人只想專政。）吉林的一个文教書記，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維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場現形記》，这就是大是大非搞清楚

了，《官場現形記》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謂“譴責小說”，是反動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專政。他們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沒落的。

在政治局常委扩大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

我們在解放以后，对知識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現在許多地方对于這個問題認識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資產階級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們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前綫》也是吳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文、史、哲、法、經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馬克思主义？

打倒閻王 解放小鬼

——与康生等同志的談話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吳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經過批准，

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嗎？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人是大学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張，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鬧天宮。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去年九月，我問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險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批 判 彭 真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北京一銀針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訓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階級斗争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們，叫孙悟空大鬧天宮，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內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落叶下長安”，告訴同志們不要无窮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階級敌人不斗不倒。”

我贊成魯迅的意見，書不可不讀，不可多讀。不讀人家会欺騙你。

現象是看得見的，本質是隱蔽的。本質也會通過現象表現出來。彭真的本質隱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訴阿尔巴尼亞同志？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

五 · 七 指 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來的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上報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的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big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羣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羣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對撤工作組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開兩個會，講了一些大學革命工作，主要講工作組要撤，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前天講工作組不行，前市委爛了，中宣部爛了，文化部爛了，高教部壞了，人民日報也不行。六一公布大字報，就考慮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

靠他們去做，不靠他們靠誰？你去不了解情況，兩個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贊，寫那麼多書，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們能了解情況，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師生。現在總是怕字當頭，總是怕亂。現在停課又管吃飯，吃了飯要發熱，要鬧事，不叫鬧事干什么？只有依靠他們搞。照目前辦法搞下去，兩個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昨天說，你們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現在工作組起了什麼作用呢？一起阻礙作用；二不會：一不會鬥，二不會改。我也不行。現在無非是搞革命，一是鬥壞人，一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權威，陸平有多大鬥頭？李達有多大鬥頭？翦伯贊出那麼多書，你能鬥了他？羣眾出對聯，講他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搞他，你們行？我也不行，各省也不行。什麼教學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羣眾，然後集中起來。

工作組改成聯絡員或是叫顧問。你們講顧問權大，那還叫聯絡員。工作組一個多月，起阻礙革命的作用，實際上是幫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組是坐山觀虎鬥，看着學生鬥學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電話、打電報，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寫上，可打電話，可打電報，可派人到中央，黨章早就有了嘛！南京新華日報被包圍，我看可以包圍，三天不出報，沒有什麼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牽涉到你頭上來。為什麼不准包圍省、市委、報館、國務院？好人來了你們不見，你們不出去，我去見。你們又派小幹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總之，是怕字當頭，怕反革命，怕動刀動槍，都不下去，不到有亂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峯、吳德，你們不去看，天天忙具體事務。沒有感性知識，如何指導？南京大學三次辯

論，我看不錯。所有到會的人都要到出亂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講話，叫講就講幾句，我們是來學習的，是來支持你們革命的，召之即來，隨叫隨到，以後再來。

你叫革命師生一點毛病都沒有？搞一、二個月一點感性知識也沒有。你去就是叫圍嗎？廣播學院、北師大打人問題，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組保護自己。沒有死人嘛！左派挨打是鍛煉。總之，工作組是一不能鬥，二不會改，千年不行，萬年也不行，只有本單位的人才能鬥，才會改。鬥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書半年編不出來，我看可以去繁就簡，錯誤的去掉，加來不及了，加要加中央社論和通知（有人提：加主席著作）那個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條，如處理廣播學院打人，哪本書上有？哪個將軍打仗還翻書？現在這個階段要把方向轉過來。

文化革命委員會，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幾個。如翦伯贊可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個活字典，但不能集中，象中華書局那樣，可搞個訓練班，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憤極大的。代表會，革命委員會都要有個對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除你（指李雪峯）那個市委，人不要多，多了他們就不革命、打電話、出表報，我這裡就一個人嘛，很好嘛。現在部長很多都要秘書，統統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沒有。市委機關可搞個收發。你夫人不要當秘書了，下去勞動嘛！國務院的部有的可改為科，龐大機關，歷來無用。

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課，二管吃飯，三要鬧事，鬧事就是要革命。工作組出來後，有些要復辟，復辟也不要緊，我們有的部長就那樣可靠？有些部、報館是誰掌握呀！我回

北京四天后还傾向保現成的。許多工作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上要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語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澤东，你抓他干什么呀！他还拥护党中央嘛！不打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現不好的斗争嘛！不准打人，叫他們放嘛！貼几張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語怕什么？

对大区書記和中央文革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今天各大区的書記和文革小組的成員都到了。會議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組的做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間状态的一些人組成学校文化大革命小組来領導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有些工作組搞了些乱子。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批、改，工作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們能斗能改嗎？象翦伯贊写了那么多書，你还没有讀，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淺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內部力量，工作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單位，不能靠工作組。工作組能否改成为聯絡員？改成顧問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員。工作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讓人家打电话，不讓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讓他們来包圍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嗎？所以西安、南京报館被圍三天，吓得魂

不附体，就那么怕？你們这些人呀！你們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圍报館，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將，說不清。为什么这样？你們不出面，我就出面，說來說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沒感性知識，那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去，取得感性知識。南京做得比较好，沒有阻擋学生上中央来。（康生同志插話：南京搞了三次大辯論，第一次辯論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辯論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辯論的結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辯論匡亞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匡亞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辯論的結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間，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問題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們看大字报时，就說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們鬧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傾的話。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識也沒有，官僚主义，去了会被学生包圍，要他們包圍，你和他們几个人談話，就会被包圍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們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鍛煉左派。派去工作組六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删繁就簡，錯誤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插話：砍掉三分之二，学习主席語录。）政治教材、中央指示、报纸社論是羣众的指南，不能当教条。打人的問題，通知上沒有写，不

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向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话，发号施令，秘书统统砍掉，我在前委的时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没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行了。（康生插话：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些部门改成科，没有办。）是呀，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局长、处长，不管事的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有人插话：北大进行四次大辩论，辩论“六·一八”事件是否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有的说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四十多人提出要撤销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职务。）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随便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暂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对中央首长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

五月二十五日翦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

（几个少先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

有给我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我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品。）

（主席叫陈伯达同志转告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很好！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同学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

借“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能靠在外面。

有些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們自己引火燒身，煽風点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同志們這樣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坐沙發吹風扇生活不行。

給羣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有些學校給學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辦的張彥跑到外面給人扣了二十幾個反革命帽子）這樣就把羣眾放到對立面去了。不怕壞人，究竟壞人有多少？廣大的學生大多數是好人。

（有人提出，亂的時候，打亂檔案怎麼辦？）

怕什麼？壞人來證明是壞人，好人你怕什麼，要將一個怕字換成一個敢字。要最後證明社會主義關是不是過了。

你們要政治掛帥，要到羣眾里面去，和羣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的插話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在治安時代以後的北洋軍閥，後來的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的。現在的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這與陸平、蔣南翔有何區別？中央下命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對另一種意見却是津津有味，說的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方向問題就是中心問題，是路線問題，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直是馬克思主義要解決的問題，感到危險。

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大家起來又加以鎮壓。所謂方向路線，所謂相信羣眾，所謂馬克思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這類的事情就要爆發出來，明明白白就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運動，為什麼不能反對。

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准來往，這是鎮壓學生，是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峯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別讓外國人知道，其實除了機密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地不讓外國人看外，其他地方有什麼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允許羣眾請願、示威游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都寫在憲法里。從這次鎮壓學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動看來，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馬克思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我看該處理。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關於第九次大會的問題，恐怕要準備一下。第九次大會

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需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大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学生和革命的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依靠群众吧，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都会实行，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样的决定有组织上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也要给他出路，要准许他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们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

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效果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要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像就照像，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峯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

孩子跑出去，回来后教育李雪琴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大家就是不检讨。伍修权家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讲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刘××给江××的信，批评了江××，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刘回答：回去看看再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问李××）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怎么样？（李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般较好。）什么一般较好？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嗷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问李先念）你们今天会开的怎么样？（李答：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讨，他们不让我说话。）你明天还去检讨，不然人家说你溜了。（李说：明天我要出国。）

你先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有点精神不足。

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走到反面。（××“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议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到南京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遵义会议后，党内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朱××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相互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

蕭、王明、羅章龍、李立三都是搞公開，這不要緊。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都是搞兩面手法。彭德懷與他們勾結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陸定一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沒有好下場，好結果。犯路線錯誤的要改，陳、王、李沒改（周總理：李立三思想沒改），不管什麼小集團，不管什麼門頭，都要關緊關嚴，只要改過來，意見一致，團結就好。要允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時陳其涵說：不能把犯王明路線的人選為中央委員。王明和其他幾個人都選上了中央委員啦。現在只走了一個王明，其他幾個人還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東山一戰他是贊成的，寧都會議洛甫要開除我，周、朱他們不同意，遵義會議他起了好作用，那個時候沒有他們不行。洛甫是頑固的，××同志是反對他們的，聶榮臻也是反對他們的。對×××不能一筆抹殺。你們有錯誤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這次會議是我建議開的，時間這麼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沒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連，就鬧起來了這麼大的事。學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難道我們出身都好嗎？不要招降納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張治中，一個人不接近幾個右派那怎麼行呢？哪有那么乾淨？接近他們就是調查研究，了解他們的動態。那天在天安門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這個人不安置比安置好，無職無權好。民主黨派要不要？一個黨行不行？學校黨組織不能恢復太早。一九五七年以後發展的黨員很多，翦伯贊、吳晗、李達都是共產黨員，都那么好嗎？民主黨派就那么壞？我看民主黨派比彭、羅、陸、楊好。民主黨派還要，政協也還要。聞紅卫兵

講清楚，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孫中山搞起來的，那時沒有共產黨，是孫中山領導搞起來的，反康梁、反帝制。今年是孫中山誕生一百周年，怎麼紀念哪？和紅衛兵商量一下，還要開紀念會。我的分一綫二綫走向了反面（康生：八大政治報告是有階級鬥爭熄滅了），報告我們看了，是大會通過的，不能單叫他們兩個負責。

工廠、農村還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學的思想，把會議开好，上海找個安靜的地方開會，學生就讓他們鬧去。我們開了十七天會，有好处。象林彪同志講的，要向他們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講階級鬥爭熄滅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肅反，這還不是階級鬥爭。你們回去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誰會打倒你們？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講几句话，兩件事。

十七年來，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就是搞一、二綫。原來的意思是考慮到國家的安全，鑒于蘇聯斯大林的教訓，搞了一綫二綫，我處在二綫，別的同志在一綫。現在看來不那么好，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能集中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作了改變，這是一件事。我處在二綫日常工作不主持，許多事讓別人去搞，培養別人的威信，以便我見上帝的時候，國家不會出現那麼大的震動，大家贊成這個意見，後來處在一綫的同志，有些事情處理得不那么

第一，常委分一、二綫，搞書記處，是我提議的。大家同意了。再嘛是敢于信任別人了。這件事引起警惕，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沒有办法，中央也沒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見在北京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吳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沒有办法。現在北京問題解决了。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1921—1949年）。开始搞民主革命，誰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斗争怎么斗争法，以后才摸出一些經驗。路也是一步一步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經驗，

659

上面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講歷史，一件事講歷史，十七年一綫二綫，不統一，別人有責任，我也有責任。第二件事，五個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點起來的，時間很倉促，與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會主義革命比起來，時間是很短的，只有五個月，不到半年，不那麼通，有抵觸情緒，是可以理解的。為什麼不通？你們過去只搞工業、農業、交通，就是沒有搞文化大革命，你們外交部也一樣，軍委也一樣。你們沒有想到的事情來了，來了就來了！我看沖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沒有想，一沖就想了。无非是犯錯誤，什麼路綫錯誤，改了就算了，誰要打倒你們！我也是不想打倒你們，我看紅衛兵也不要打倒你們。有兩個紅衛兵對李雪峰講：“沒有想到我們老前輩為什麼怕紅衛兵？”還有伍××四個小孩分成四派，有的同學到他家裏來，有時一來好幾十個，有好处，我看跟小孩接觸很有好处。大接觸一百五十萬幾個頭就結束了，也是一種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這次會議發的簡報不少，我幾乎全部看了。你們過不了關，我也不好過，你們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們，因為時間太短。有的同志說不是有心犯錯誤，是糊里糊塗犯了錯誤，可以原諒。也不能完全怪××同志和××同志，他們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中央也沒有管好，時間太短，新的問題沒有精神準備，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做好，我看十七天會議以後會好一些。

還有哪個講？今天就完了。散會。

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十月）

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不說他有能力嗎？（聶榮臻說：這個人很懶。）

對形勢的看法，兩頭小、中間大。“敢”字當頭的只有河南，“怕”字當頭的是多數。真正“反”字的還是少數。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有薄一波、何長工、汪鋒，還有一個李范五。

真正四類幹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總理說：現在已經大大超過了。）多了不怕，將來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調到別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個書記搞生產，其餘五個書記搞接待，全國只有劉建勛寫了一張大字報，支持少數派，這是好的。

聶元梓現在怎麼樣？（康生說：還是要保。李先念說：所有寫第一張大字報的人都要保護）對！

（談到大串連問題時總理說：需要有準備地進行。）要什麼準備，走到哪里沒飯吃？

對形勢有不同看法，天津萬曉棠死了以後，開了五十萬人的追悼會，他們以為這是大好形勢，實際上是向黨示威，這是用死人壓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計委誰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紀律的，有些事對書記處講了，書記處沒有向我講。鄧小

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对中央文革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号造了反，《解放日报》六号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

《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转载，电台可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纸，依我说封了好，但报还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总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许多事宣传部、文化部都管不了，你（陈伯达）我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

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那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与各种人，左、中、右都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样干净，我向来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他们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青年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

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是他们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谢胡同志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的？（答：去年五月。）当时我就曾说究竟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还说过，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有利，可以不轻视敌人。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

爭，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或幾十年，中國就可能變顏色。這篇講話沒有發表，不過那時已看出一些問題。六二年到六五年期間，為什麼說我們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好呢？說的不是客氣話，說的是真話。我們過去只抓個別問題，個別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饒，五九年把彭德懷、黃克誠整下去了。此外，還搞了一些文化界及農村、工廠的鬥爭，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你們也是知道的，但都沒有解決問題，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所以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對文化大革命也進行了一些準備。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對吳晗發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寫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這個攤子開始是江青她們搞的，當然事先也告訴过我，文章寫好後交給我。她還說：只許我看，不能給周恩來和康生看，不然劉、鄧這些人也要看。劉、鄧、彭、陸是反對這篇文章的，文章發表後全國轉載了，北京不轉載。（湖南也未轉載，張平化作了檢查——有人插話）那時我在上海，我說把文章印成小冊子各省打印發行，就是在北京不打印發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是水也潑不進，針也插不進。現在不是改組了嗎？還不行，還得改組。當發表改組市委時，我們增加了××個衛戍師，現在是×個衛戍師。以前×師是好的，但太散了。現在紅衛兵幫助我們，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鏡、口罩，手里拿着棍、刀到處搗亂，打人、殺人，殺死了人，殺傷了人。這些人多數是高干子弟，如冀龍、陸定一的女兒。所以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六五年十二月解決了羅；六六年六月一日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廣播了，八月紅衛兵出現發動了羣眾。去年聶元梓寫的一張大字報，當時我

在杭州，一天我看到這張大字報，我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要廣播這張大字報，這樣大字報就滿天飛了。清華、北大兩附中寫了兩件材料，我看了，八·一我寫信給這兩個學校的紅衛兵，後來紅衛兵大搞起來。八·一八我接見了幾十萬紅衛兵，接着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我寫了一張二百多字的大字報，當時就從中央到地方，一些負責人反對學生運動，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搞白色恐怖，這樣才揭發了劉鄧的問題，現在雙方正在決戰，還未解決，今年三、四月可能看出眉目，解決問題可能到明年三、四月份，也可能更長一些時間。好幾年前，我就要洗刷幾百萬，那是空話，他們不聽話嘛！毫無辦法。人民日報奪了兩次權，就是不聽我的話，我去年就聲明人民日報我不看，講了好幾次他就是不聽。看來我這一套在中國不靈了，因為大中學校長期掌握在劉鄧陸手里，我們進不去，毫無辦法。

我們黨內暴露出來的問題，可以分幾部分人：

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民主革命時期可以合作，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他是贊成的，打倒官僚資本主義他也是贊成的，打倒民族資產階級他就不贊成了。把土地分給農民他是贊成的，合作化他就不贊成了，這一批有的是所謂老幹部。

第二部分是解放後才進黨的人，有百分之八十解放後才進黨的，其中一部分當了幹部，有的當了支部書記，縣委書記。

第三部分是收留下來的國民黨。這些人有的過去是共產黨，以後叛變了，登報反共。那時不知道，現在查出來了，他們不擁護共產黨，反對共產黨。

第四部分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子弟，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学，掌握了一部分权，不都是坏人，有的是站在我们这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总之坏人在中国不多，大概也不过百分之几。如地、富、反、坏顶多百分之五，约三千五百万人。他们是分散的，分散到各农村，城市和街道。如果集中到一起，手中拿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敌了。他们是灭亡了的阶级，其代表人物在三千五百万人顶多不过几十万，也是分散的。所以大字报、群众运动、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就吓的要死。

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特别是文科。不搞文化大革命他们就要变成修正主义分子，搞修正主义了。文科不能写文章，哲学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经济学可多呢！现在看来有希望，斗得很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博同志：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到明年这个时候，可以这样说了，但是我们也许被敌人打败，打败就打败了嘛，总是有人革命的。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博同志：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就是嘛！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象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

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获秋陈丕显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就成了反革命，夏季是少数，冬季就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井冈山”、聂元梓受过压迫，很革命，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一月份分化了。但不管怎样，总是好人多。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头上，不行的。不过斗来斗去，错误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街上有打倒×××、×××的大字报，打倒×××、×××的大字报就更多了。×××是×××，管好几个部，××部要打倒他。打倒××是××军区司令部的提出来的，过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但是有条永远的真理，那就是绝大多数党、团员和人民是好的。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

二月至四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

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兩千人嗎？現在已經到了一百多万人啦！說明上海的工人发动得比較成功。

我們現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專政下的革命，是我們自己搞起来的。这是因为，我們的无产阶级專政的机构中間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要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考虑一下，写文章，就叫作“无产阶级專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論問題。

一定要三結合。福建的問題不大，貴州的問題也不大，內蒙古問題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現在山西省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羣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向他們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但二、三、四月間更关键、更重要。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我們这儿还有个單位，連副科長都不要。副科長都不要的人，这种人是搞不了几天的。）

應該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羣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們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佔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以至于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只要我們善于領導，他們也是会跟着我們走的。我們要相信大多数。

* 此文是根據張春桥同志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人民廣場的講話录音稿和有关傳單整理的。是否每句都是毛主席的原話，很难断定，只供参考。

一个大学生，領導一个市，剛剛毕业，有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我看当个大学校長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長，学校复杂，你是一个剛剛毕业或还没有毕业的人，学校情况很复杂。照我看，当一个系主任也不行。系主任总要有一点學問吧！你这个學問还没有学完，大学剛剛毕业，學問还不多，而且沒有教書的經驗，沒有管理一个系的經驗。搞个系主任，我們已經培养了一批助教、講師。原来的領導干部，总要选些人出来。这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恐怕周谷城不行了吧？周谷城再教書不行了吧？

巴黎公社，公社，不是我們都講搞巴黎公社是个新政权嗎？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現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敗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現在也已經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許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大。这是巴黎公社。苏維埃的政权形式，苏維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認為这是工农兵的一个偉大的創造，是无产阶级專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沒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魯曉夫也可以用。那么，現在苏維埃，从列宁的苏維埃变成了赫魯曉夫的苏維埃。

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嗎？美国是总统制，它本质上还是一样，都是资产阶级專政。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他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样的哪一个国家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印度的好一点。这是从現在的表现来看。旧中国的三皇五帝，周朝是叫王，秦朝是叫皇帝，秦始皇他把三皇五帝都叫了。

太平天国就叫天王，唐太宗也是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們不是只看名称变了，問題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內容。

名称不宜改得太多，我們不在名詞，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內容。汉朝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他一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都象現在我們很多人不喜欢“長”啊，都改了，他統統改了，把全国的县名也統統改了，有些象我們紅卫兵把北京街道名字改的差不多，改了大家都記不得，还是記老名字。王莽下詔書，下命令都困难了，老百姓也不知道是改成什么了，这样使得下公文就麻煩了。話剧这个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

主要經驗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維埃，我們也可以設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如果我們被推翻，资产阶级上了台，他們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誰掌握这是根本問題，不在于名字。

我們是否还是穩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字了。因为这样就发生了改变政体的問題，国家的体制問題，国号問題，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叫什么主任、社長呢？不但出了这个問題，还出了一个問題：如果改就紧跟着有个外国承認不承認的問題。改变国号，外国大使就作廢了，重新換大使，重新承認。我估計苏联就不承認，他不敢承認，因为承認会給苏維埃造成麻煩，怎么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認。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

委員有黨員和非黨員，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該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貫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嗎？

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的改变，不解决內容問題。現在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是否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条規定了。

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不改，还叫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大家喜欢这个公社。缺点是全国只有你們一家，你們不很孤立嗎？現在不能登《人民日报》，大家都要叫人民公社，中央如果承認人民公社，登《人民日报》，那样全国都要叫，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們叫？这样不好办。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第二个办法就是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認，很多麻煩事，也沒有什么意思，沒什么实际意义。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这样就 and 全国一致了。当然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馬上改，如果大家說还是不想改，那你們就叫一个时候。你們看怎么样啊，能說得通嗎？

刘少奇的《論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馬列主义的。現在我們的斗争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老是“砸爛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應該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文章批判。

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好的，你上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二百人吗？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的人了。工人组织起码一百万人了，这就说明上海的工人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处理上海红革会问题的《紧急指示》我看过，写得很好，有造反派的气魄，最后一点说：“将采取必要措施”，这一次炮轰张春桥太会如果开的话，一定要采取必要措施抓人。

（上海人民）公社在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抓人前门进，后门出。

一、二、三兵团怎样？他们上这里来告你们的状。

你们那个时候学生都不是到了码头吗？现在那些学生是否还在码头上啊？（张春桥回答说：还在）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正结合好，现在才是真正结合。

《文汇报》搞得很好，很同意他们对里弄干部的观点，我支持他们。有几笔账以后算。

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

（一九六七年二月）

五四运动风流人物，有影响的人物，五四运动的右翼是胡适，后来他成了美帝的走狗，五四运动的陈独秀也成了反革命。当时的李大钊，写的文章也不多，但他埋头工作，后

来成为革命的左派。还有鲁迅，当时他重视社会调查，独立思考，后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不做曇花一现的人物，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密切联系群众。

中国历次的革命及我们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曇花一现的人物。

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

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潑不进，針插不进。当时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这个紅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可以，讓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議再讓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議：“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林彪同志插話：有人說毛澤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現在中央領導同志凡是在革命羣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將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給他們了，所以他們未犯錯誤。我看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倒是一个不考試的考試，誰能紧跟馬列主义毛澤东思想，誰就是无产階級革命派。所以我总說对毛澤东思想理解的要执行，暫時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報紙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議出小冊子，也受到抵制，沒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所以我在中央特別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通知。因为敌人是非常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們也必须行动。这个通知中已明显地提出了路綫問題，也提出了兩条路綫的問題。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暫時只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將我的看法帶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討論。通过爭論我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瀾濤也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們談，他們說：“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讓实践去进一步檢查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

月、十二月三个月，对資產階級反动路綫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地挑开了党内矛盾。这里順便提起一个問題，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綫过程中受了蒙蔽。我們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認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絕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階級各个时期的革命，他們都是主力軍。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的工农是具体的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是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紅旗”反紅旗，所以他們受了蒙蔽，甚至較長一段時間內轉不过来，这里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算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們又成了主力軍了。

“一月风暴”就是工人搞起来的，随着全国工农起来了。这是革命发展規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識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識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長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軍去完成，靠工农兵去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軍裝的工农。批判資產階級反动路綫是知識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軍去完成。知識分子从来就是轉變觉察的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机性。

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講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階級專政》。

以后，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的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

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答）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嘛！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业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要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地由

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国家大事，世界的大事。

我說，革命小將革命精神很強烈，這很好。但你們現在不能上台，你們現在上台明天就會被人趕下台。但這話被一位副總理從自己話里說出去了，這很不對。對革命小將是個培養問題，不能在他們犯有某種錯誤的時候，用這話給他們潑冷水。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我是北京區選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幾個真正了解我？我認為周恩來當總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說中國是酷愛和平的，我看就不那麼樣達到酷愛的程度。我看中國人還是好鬥的。

對待幹部必須首先建立一個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信念，不能離開這個階級觀點！對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領導幹部，就要保，要理直氣壯的保，要從錯誤中把他們解放出來。就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經過長期教育，改正了錯誤，還是允許他們革命的。真正的壞人並不多，在羣眾中最多百分之五，黨團內部是1——2%，頑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一小撮。但這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必須作為主要對象打，因為他們的影響及流毒是深遠巨大的。所以也是我們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羣眾中的壞人，最多只是5%，但他們是分散的，沒有力量的，如按5%三千五百萬算，如他們組成一支軍隊，有組織地反對我們，那確實是值得我們考慮的問題，但他們分散在各地沒有力量，所以不能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鬥爭的關鍵階段，更要防止壞人鑽空子。所以大聯合應有兩個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須經過鬥爭。不經過鬥爭的大聯合是不能奏效的。

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階段，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關鍵階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時間比較長，中央文革還在討論，有人認為今年年底為宜，有人認為明年五月份為宜。但時間還得服從階級鬥爭的規律。

關於對外宣傳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

有些外國人對我們《北京週報》、新華社的對外宣傳有意見，宣傳毛澤東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過去不搞，現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大搞特搞，吹得太厲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話何必要自己來說？我們要謙虛，特別是對外，出去要謙虛一點，當然就不要失去原則。昨天氫彈公報我就把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統統勾掉了，把“光焰無際”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無際的？都有“際”，所以勾掉了。“萬分喜悅和激動的心情”，我把“萬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萬分，我一分也不要，統統勾掉了。

中國要成為世界革命的兵工廠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毛主席在七月七日接見了×××會議全體人員，毛主席聽了匯報後說：

“新武器、導彈、原子彈搞得很快，二年零八個月出氫彈，我們發展速度超過了美國、英國、法國、蘇聯，現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導彈原子彈有很大成績。這是赫魯曉夫幫忙的結果，撤走了專家，逼着我們走自己的路，要給他一噸重的勛章。”主席聽了匯報後感到××太落后了，而且數量也很少。主席說：“現在形勢很好。印度拉加族反對國大黨，搞武裝鬥爭。印尼共產黨清算了修正主義，已起來。緬甸游擊隊有很大發展，比泰國武裝鬥爭還有基礎，已搞了几十年，過去黨不團結（有紅旗黨、白旗黨）現統一起來了，反對奈溫是一致的。武裝活動的地區已占緬甸土地的百分之六十，緬甸比越南的地理條件還要好，回旋區大。泰國的地理條件也很好，緬甸起來，泰國起來，這樣就把美國完全拖在東南亞。當然我們還必須着眼在我們國土上早打大打。緬甸政府反對我們更好，希望它同我們斷交。這樣我們可以更公開地支持緬甸共產黨。亞洲形勢如此，非洲、拉丁美洲武裝鬥爭也有很大發展。美帝國主義更加孤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帝國主義是戰爭禍首，全世界人民、美國人民都反對它。蘇聯修正主義也更加暴露，特別是這次中東事件。蘇聯也是採取赫魯曉夫那一套，本來他派往阿聯軍事專家兩千多人，先是採用冒險主義，把軍艦開了去說服阿聯不要先出去，同時用熱綫告訴了約翰遜（赫魯曉夫那時候沒有用熱綫）後，約翰遜很快告訴了以色列實行了突然出擊，把阿聯百分之六十的飛機都消滅在地面上。蘇聯援助阿聯一共二十幾個億，打掉了二十億，最後阿聯投降停了戰。這是出賣民族國家的又一次大暴露。對蘇聯，不僅是阿拉伯國家，亞洲、拉美都反對，蘇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自殺，就是一種不滿。中東戰爭不

久，蘇聯召集了几次東歐國家會議，羅馬尼亞不簽字，也未和以色列斷交，後來毛雷爾跑到中國，和我們搞全面經濟合作。單項協作也可以，全面協作我們不干。帝修更加孤立，越南戰爭堅持下去。目前許多地方反華，形式上好象是我們孤立，實際上它反華是害怕中國的影響，怕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反華是為了鎮壓國內人民轉移人民對它統治的不滿，這個反華是美帝、蘇修共同策劃的，這不表示我們的孤立，是我們在全世界影響大大提高，它越反華越促進人民的革命，這些國家人民認識到中國的道路是解放的唯一道路。我們中國不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軍事上、技術上也要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給他們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區），就是要公開地支持，要成為世界革命的兵工廠。但是我們許多技術未解決。”

主席講“要把×××××，×××××狠狠地抓一下。”
總理批評“四機部落後，四部機要大大趕上去。”

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

在上海的談話

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誓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對工總司匯報材料的批語）

張春橋：上海有些組織不能联合起来。

毛主席：为什么联合不起来呀？

張春橋：以誰为核心的問題沒有解决。

毛主席：不要強調这个，要无条件。以誰为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王明、陈独秀他們也是強調以自己为核心，結果他們不是都失敗了嗎？

在浙江的談話

南萍：我們還有罰跪、戴高帽等現象。

主席：我向来反对这样搞，对待干部不能象对待地主一样。我們有个好的傳統：團結——批評——團結。对干部要一分为二。

在江西的談話

程世清：（汇报收交武器情况）

主席：这些枪是誰发的？我看兩方面都发了。誰发的多？

程世清：軍分区、人武部給保守派发的。

主席：哦！

（談到撫州問題時）

主席：撫州的問題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們会这样大胆？他們总要开会研究形势，使人相信全国和世界形势對他們有利，才这样干。他們对形势估計不正确，我看是。

（談到撫州一派控制了九个县時）

主席：从这一点看，他們是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这是什么性質的問題呢？

程世清：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是軍事叛乱。

主席：你們定了沒有？

程世清：定了。

主席：批了嗎？

程世清：总理批了。

主席：哦！性質是叛乱，是总襲击。說中国沒有內战，我看这就是內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贛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隊抽十几个人，採取強迫的办法，記工分，一天六毛錢。現在农村包圍城市，我看不行。

（談到中央关于处理江西問題的決定時）

主席：我看还应该从教育着手，坏人总是少数。人武部总是好人多，軍分区有很多人受蒙蔽的。有人犯了錯誤，要給他改正錯誤的机会。

造反派的羣众，要很好說服，不打击报复。杀人总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他也不好，要說服教育。打击报复、下跪、高帽子、挂牌子，还有一个噴气式嘍，这不好。

（談到《文汇报》写了一些好文章，影响很大時）

張春橋：人家还反我們右傾，說我們右了。

主席：是教育左派的問題，不是右傾的問題。比如，过去有多少山头呀，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贛苏区，閩贛苏区，湘鄂贛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通南巴、陝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們用一个綱領團結起来，管他那一派。不能只要一个山头，不要別的山头。只有一派怎么行呢？

我还是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們爭取了多数，极少数的人頑固下去也可以嘛，我們給他飯

吃算了。

我看《火綫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鋼、廬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圍城市。六、七、八月間最緊張，緊張的时候，我看問題就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緊張怎么解决呀！

現在有人挑撥战士反对長官，說你們每月只有六块錢，当官的錢多，还坐汽車。农民是愿意当解放軍的，解放軍光荣，他們每月还有六块錢，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撥不起来的。

（談到准备在十月召开全省造反派政工會議时）

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訓，他們坐不下来了，心野了。

我对現在的右派，不那么看死，一訓，就轉过来了。有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認識問題。有的把認識問題說成立場問題。一拉到立場問題就上了綱，一輩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場問題就不能改变嗎？对大多数人來說，立場是能变的，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縮小，教育面要扩大，包括左、中、右。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

在湖南的談話

（談到大联合时）

都要作自我批評，都要少講別人的缺点，不要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們有个經驗，过去軍隊和地方的关系，軍隊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軍优屬，軍隊帶头作自我批評，兩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

兩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們。对受蒙蔽的羣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們

也是蔣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們只有几万人，蔣介石压我們，我們就有希望了，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紅軍、三十万黨員。

在湖北的談話

（談到解放干部問題时）

我这个人五次是被人排挤的，后来又要請我回来。所以，羣众領袖不是自封的，是在羣众斗争中成長的。什么叫長征？長征是打出来的，是逼出来的。長征之后，質量就提高了。就是現在这些干部，那个在戰場上没有受伤？在革命中不犯錯誤？在民主革命中还是立了不少功，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只要改正就行了。老干部到打起仗来，我的命令一下，他們上戰場还是很勇敢的。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好，对革命事业不利。

中国历次革命，依我亲身經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是想問題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曇花一現的人物。

在河南的談話

毛主席：你是紀登奎？老朋友了。

刘建勋：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的斗争。

毛主席：（对紀登奎）你說一点好处都沒有嗎？

紀登奎：大有好处。

毛主席：那是文敏生、赵文甫、何运洪他們搞的。我上次路过郑州时，看到一个大标語：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刘建勋：（汇报干部情况）

毛主席：何运洪那么厉害！何运洪干的好事！

（谈到军内情况时）

毛主席：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么响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

在同京火车上的谈话

（铁路系统三派在火车上达成大联合协议，向主席报喜）
祝贺你们，送你们四个字：斗私，批修！

给林、周及中央文革的信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林、周及中央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主席：（聶元梓、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走進接見會場，主席站起來同他們一一握手）都是年輕人！

（主席同黃作珍握手）你叫黃作珍？我還不認識，沒有打死？

江青：好久不見了，你們又不貼大字標語。

主席：還不是天安門上見過，又沒有談話，不行嘛！你們是无事不登三寶殿，但是你們的小報我都看過，你們的情況，我都了解。

蒯大富沒來，是出來不了，還是不來？

富治：恐怕是不肯來。

韓愛晶：不會的。這個時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見會不來，他見不到主席會哭的，肯定是出不來。

主席：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人“鎮壓”“壓迫”紅衛兵，黑手是什麼？現在抓不出來。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敢來，抓我就好，來抓我嘛！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是我派去的。我說大學武斗怎麼解決，你們去工

作看看，結果去了三萬人。其實他們恨北大，不恨清華。（對聶）工人、學生這麼搞，幾萬人遊行，聽說你們那里搞招待還好，是你們，還是井崗山？

溫玉成、黃作珍：不是他們。北大和那個單位衝突了？

聶元梓：是與農科院。

主席：你們沒跟他們打？

聶元梓：我們還在門口擺了茶水。

主席：那不知道。北大抓黑手，這黑手不是我，是謝富治。我也沒有這麼大的野心。我說你們去那麼一點人，跟他們商量商量。蒯大富說有十萬。

富治：不到三萬人。

主席：你們看大學武鬥怎麼辦？一個是統統撤出去，學生也不要管，誰想打就打，過去革委會、衛戍區對大學的武鬥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這看來還是對的。另一個是幫助一下，這個問題深得工人的贊成，深得農民的贊成，深得多數學生的贊成。大專院校五十幾個，打得凶的，也是大概五、六個，試試你們的能力。至於如何解決，你們一個住南方，一個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個括弧（井崗山）、（公社），就象蘇聯共產黨（布），不能……要么軍管，請林彪同志掛帥，還有黃永勝，問題總要解決嘛！你們搞了兩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現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們是搞武鬥，人民不高興，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多數學校學生不高興，你們學校多數學生也不高興，就連擁護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興。就這樣統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爺是多數，是哲學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沒有反對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當面不說，背

后還是會說怪話。王大賓，你的事情好辦一些吧？

王大賓：那幾個反對謝富治的跑了。

富治：他的二把手要奪權，說他右了。

主席：他就那麼左，馬克思？

王大賓：那是他們挑撥關係。他是一個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這個人很正直，革命幹勁也大，革命性強，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團結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主席：你能團結他嗎？一個左，一個右，很好團結嘛！你坐過來，到我這兒來。

林總：來嘛！

富治：去！去！（王大賓坐到主席身旁）

主席：坐下，坐下。

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學生。他們也沒有搞黑幫，最近有些學校鬥了黑幫，畫了像。新北大搞了幾十個，就那麼點黑幫？我看不止那麼點黑幫。就是關鍵在於兩派，忙於武鬥，心都到武鬥上去了。這麼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學生不講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現在逍遙派那麼多。現在社會上說聶元梓、蒯大富的壞話多起來了。聶元梓的砲灰不多，蒯大富的砲灰也不多，有時三百人，有時一百五十人，那象林彪、黃永勝那麼多。這回我一出就是三萬多。

林總：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鬥工事統統拆掉，什麼熱武器、冷武器，要刀槍入庫。聶元梓，他們叫你“老佛爺”、“佛爺老窠”。還有你這個譚厚蘭同志，梳兩個小辮子，你要求下放，在學校里讀了十多年書，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開，你走了，誰代替你呢？

譚厚蘭：都安排好了。

主席：你們這五大將，我們都是護你們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們有偏向。（北大）井崗山、四·一四（師大）兵團就會對我們有意見。我不怕別人打倒。清華四·一四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個理論家叫周泉纓，理論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論家，寫篇文章你抓他幹什麼？把他放出來。人家有意見，讓他再寫嘛！不然說沒有自由了嘛。我說你老佛爺，也大方一點，你北大井崗山幾千人，那一河水放出來，大水沖了龍王廟，你受得了受不了？你這個老佛爺，不然就實行軍管。第三個辦法，按着辯證法，不要住一個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崗山搬到南方，一個南，一個北，根本不見面，打不起來，各人清理自己內部，一統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爺老窠一搗，搗得你睡不着覺。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麼緊張呢？怕人家打，你不留點後手，人家一沖怎麼得了啊？听人家說了，不是有個凶手要戮你嗎？知道了凶手是誰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說了。不過你以後要注意一點，不要一個人到處亂跑。

江青：她有人保鏢。

聶元梓：沒有。

主席：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這個聶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為什麼一定要牽連妹妹呢？（有人報告找不到蒯大富）

江青：蒯大富是不愿來，還是來不了？

富治：廣播了，点名說中央文革要找，請蒯大富開會。

他就是不肯來。

江青：是他不肯來，還是出不來？

富治：我估計到有人控制他。有控制也不要緊。

文元：有可能。

主席：蒯大富這個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縱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這個經驗很多。王大賓，你那里沒有打架？

王大賓：沒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與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達同志派人救了我們，以後我們取得了勝利。

主席：那就好，以後一個你，一個韓愛晶沒有打架了。韓愛晶，很會出主意啊，是個謀士啊，是不是韓信的后代？

康生：聽說蒯大富是司令，韓愛晶是政委。

韓愛晶：蒯大富周圍有一批人，里边比較複雜。運動初期靠寫大字報起家的人數極少了，武斗這批人多了，要求改組總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康生：不是你說的那樣吧！

主席：譚厚蘭，文化革命兩年了，你那個一、二百人的兵團也弄得睡不着覺。你暫時還不能走，你是一個女皇。今天到會四個，有兩個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暫時不能走。要給他們糧吃，出入無阻，那些人也夠慘的。他們是省無聯式的大雜燴，還要搞反奪權。別的学校也參加了，你（指韓），蒯大富都有分。

韓愛晶：我也參加了。

江青：那是韓愛晶去顛覆人家。

主席：你有份，我們的劇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會作些坏事。你們說中央文革沒打招呼，林彪同

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講了話，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講了話，可是下面还打，好象專門和我們作对。我們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們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兩方都有土炮，你們算什么打嘛！你們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象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敗家子。

主席：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調起兵来也只有那么兩三百，你的兵跑那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員軍人作主力，沒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給你几千几万，可把“井崗山”通通消灭嘛。这問題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討論討論，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总：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講了四个方案：第一是軍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主席：一分为二，因为結了仇，双方緊張得很，兩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問題，找地点，在北京就会爭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紅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聶元梓来，或者候汉卿来（北大井崗山头之一）。

你們不是叫“杀牛宰猴燉羊肉”，牛是牛輝林，猴是候汉卿，羊是楊克明。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楊克明，楊克明也是个年青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楊克明还帮了忙，你們这张大字报分成兩家，这种社会現象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誰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課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長一年，不行再延長一年、二年、三年。我說，如果不行，要多長时候給多長时候，反正人是会

長的，你一年級現在就是三年級了，再搞兩年、四年、八年的，还不是……

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譚厚蘭不是想走嗎？走光，扫地出門。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講話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講了理工科，並沒有說文科都不办，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課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頂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課都是重复。这專業課 先生都不懂專業，哲学家講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聶元梓不是哲学家嗎？

聶元梓：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她是老佛爷。

主席：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嗎？又沒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总：越学越窄，是“窄学”。

主席：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說，每周給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現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說。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沒有看到什么了。

总理：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腦就僵化了。

主席：我跟你們講講馬恩列斯，除了馬克思、列宁讀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沒有讀完。列宁讀法律讀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讀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會計。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倫敦圖書館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沒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

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主席：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总：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主席：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总：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主席：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课。

林总：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主席：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林总：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跟××辩论，他问我《孙子兵法》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是什么题目，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望一遍。

江青：……

主席：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就是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亏了，学外文要赶，年青的时候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分别问了每人，王大宾学俄文）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学起。

韩爱晶：主席文化革命完了，就叫我当兵去吧。

主席：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干什么？当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算什么知识分子啊？算土包子。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一年半。

主席：你家是什么成份？

永胜：算下中农。

主席：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

玉成：三年。

主席：你家是什么成份？

玉成：算贫农。

主席：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那点学问，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

林总：黄埔军校有个×××，蒋介石奖他一只表，后来在南京，打仗就是不行。

叶群：他是反对主席的。

主席：在世界上不被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总：×××在南京军事学院，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主席：斗批散也是办法，是譚厚蘭的道路。譚厚蘭現在不是想走嗎？我並沒有說文科不要辦，但要改變方法。文學的要寫點小說、詩歌，學哲學的要寫論文，論述中國現在的革命鬥爭過程。至於法律，恐怕是不學為好。聽說天派是反謝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爛公檢法，砸爛謝富治”，實際上砸爛公檢法是謝富治第一個提出來的，北京公安局三萬人，才弄出几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爛公檢法，三千人只留下有几十人，其餘進學習班。你們也提口號，謝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的抓。人大三紅總部不講話，用個小戰鬥隊的名義出大字報打倒謝富治，一去追究責任呢，就說“我們總部沒有打倒謝富治，只是一個戰鬥隊”。他們提出打倒趙桂林，趙桂林，我不認識，你們那點材料我看了，趙桂林怎麼反革命呢？聶元梓、侯漢卿你們還沒有提反革命吧？

聶元梓：他們在社會上搞了個反動集團，惡毒攻擊毛主席、林副主席。

主席：我們這些人譴蔑些也不要緊。牛輝林的綱也上得不好（北大井崗山的頭頭之一），又不是什麼大的政治問題。

法律也不一定是否定。政法學院，一個政法公社，一個政法兵團，他們听了要不高兴吧？把時間減少，拾工農子弟。

鞍鋼有個審訊偵緝的案子，由羣眾辦，他消息靈通，多少年沒查出來的案子搞出來了。公安局預審，沒有別的办法，打人。由偵緝得來的材料不確切。

軍管會還不是丘八？溫玉成這個人不認識幾個人，就根據偵緝……能行嗎？我們說學習羣眾，說一不要殺，二不要判刑太長，判他兩年、三年算了。軍隊過去也關禁閉，現在

有沒有了？逃兵你們還抓嗎？

溫玉成：禁閉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主席：人家想逃，你抓回來幹啥？斗批走，要走就算了。為什麼要走呢？還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裏有事，或者軍隊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抓，不關禁閉，反而比過去少了，我們是人民解放軍。現在學校里抓了人就當俘虜，逼、供、信，不供就打，打死了，打傷了。我看知識分子最不文明，你說什麼知識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黃永勝、溫玉成他們就不抓逃兵，不關禁閉。現在發明了一種噴氣式，這個罪魁禍首就是我。我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講“戴高帽子遊街”，但我可沒講坐飛機。我是罪魁禍首，罪責難逃啊！

今天怎麼樣，以為抓你們來坐禁閉嗎？井崗山他們這個作法不好，我說的是剿司令的井崗山，打死子四個人，打傷針織總廠五十個，就是這個社會影響。我也不是看一個人，損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總：值得，損失最小。

總理：林副主席說得好，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

主席：如果以後有工人到你們那里去，應採取歡迎態度，你們不要採取剿大富這個方法。

總理：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廠串連，人家歡迎你們，就沒有打你們。

主席：讓他們宣傳嘛，不要開槍，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去的嘛。不是說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嘛，工人階級專政嘛，專你們學校里少數壞人的政。你們都是知名人士，你們應專學校壞人的政，不能專工人的政，包括剿司令在內。

現在還在搞串連會，又在清華開會，又在北航開會。還在什麼和平里開會。很多是外省來的，又是廣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遼寧八·三一的一部分，錦州的糟派，黑龍江的炮轟派，廣東的旗派……不要搞這套。

林總：我們沒有開九大，他們就開了。

總理：也沒有開十二中全會。

主席：還說什麼中央開十二中全會，鬧得一塌糊塗，鬥爭很激烈，什麼“社會鬥爭是中央鬥爭的反映”，不是社會鬥爭反映中央，應當是中央鬥爭是社會鬥爭的反映。

總理：北航開什麼國防系統會議，開了沒有？

韓愛晶：一吓沒敢開。

總理：不要開了，你知道的嘛，國防機密嘛！

主席：我為什麼不找你們的反對派呢？今天找你們來談這事，使你們有準備啊！我是歷來不搞錄音的，今天錄了，不然你們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們各取所需，我就放我這錄音。你們先去討論討論。這麼一放搞許多人都被動。

搞了這麼多天不算數，開了這麼多天會，開始黃作珍講話不算數，找蒯大富也不算數，一定要讓中央直接表態。除了開始管一下，後來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謝富治來管嘛，過去召集你們開會，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當官僚了。這次怕你們把我開除黨籍，官僚主義就開除，我又是黑手，鎮壓紅衛兵。

林總：昨天我開車子，我說去看看大字報，我問怎麼沒有北大、清華的大字報啊？人家說：他們武鬥。我說：你們脫離羣眾，羣眾要求制止武鬥的呼聲很高。

主席：羣眾就不愛打內戰。

林總：你們脫離了工農兵。

主席：有人講，廣西布告只適用於廣西，陝西布告只適用於陝西，在我這裡不適用。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性的布告。誰如果還繼續違反，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開闢。

林總：現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國民黨，打着我們的旗號造反。廣西燒了一千間房子。

主席：在布告上寫清楚，給學生講清楚，如果堅持不改，就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實行圍剿。

林總：廣西燒了一千間屋子，還不讓救火。

主席：國民黨還不是這樣！這是階級敵人一種垂死掙扎。燒房子要犯大錯誤。

林總：我長征進廣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計，先放火冒充共產黨。現在是舊計重用。

韓愛晶：蒯大富是騎在虎背上下不來……

康生：不是你說的那種情況！

主席：騎虎下不來，我把老虎打死。

總理：廣西老多也在你北航。國國防科委系統你怎么召集會議？

主席：你們把廣西四·二二藏起來了。廣西學生住在北航。

康生：他們想控制全國運動。

韓愛晶：那個會不是我們召集的。可以調查，是廣東武傳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體院。學校里打來電話，接待兩個省革委會常委。別人講“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

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连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質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崗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

康生、文元：……

主席：你们把韩爱晶讲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三岁嘛！

江青：在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访，你们接待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富治：是江青同志。

江青：对师大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们做得出来！我听了就要流淚。他几百个、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韩爱晶：我错了。

主席：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政府主义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能消灭，这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对右倾机会主

义的惩罚，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我对你们那个对立面并没有好感。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不是替他们说话，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几十个反革命，也是年青人。绞死我，我不怕别人油炸，北大井崗山说要油炸江青。

文元：油炸也只是说一说。

主席：还有个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

富治：牛辉林不好。

江青：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聶元梓，我还有点发言权没有？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了起来。我说过四·一四必胜吗？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是他是群众组织啊！

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绞死就绞死，要油炸就油炸好了，我们都是一同患难过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治国平天下，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

主席：可以不提了。“杀牛、宰猴、火燎羊肉。”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例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主席：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总理、叶群：是伊林、赫西吧。

主席：此外，北外六·一六领袖刘公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

联动这些人开始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富治：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主席：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也是我叫抓的，但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富治：没叫我抓那么多。

主席：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两个月，他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是弄几个钱，玩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

总理、文元：不好，她的父母很坏，与伍修权搞在一块。

江青：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但他们是群众组织。

主席：他们几千人是不搞掉的，北大井岗山几千人也不搞掉，有坏人自己揪，“杀牛、宰猴、嫩羊肉”不要再提了。牛可耕田，猴宰它干什么？

江青：我们对你们是有政治责任的，在政治上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井岗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主席：你那下山的人都靠不住，你那井岗山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岗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犯过很多错误，你们初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没搞他，他和彭言反革命集团搞在一起。

主席：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主席：侯汉卿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是研究生，他父亲在六三年投机倒把。

江青：最坏的不是他们，他们是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的，里边有坏人，外围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主席：这作风不好。

你们今天来了两个地派两个天派。地派支持清华四·一四、北大井岗山，天派的保护荆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有经验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荆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它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就这五个。你们作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护着你们，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富治：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付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主要责任在于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主席：首都大專院校的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们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连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们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富治：对我帮助很大。

主席：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总：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

主席：小孩子搞大报纸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富治：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主席：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哩。中国人有个好处，有意见他要讲出来，讲不讓串連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讓串連也不好，人家还在串連。砸三旧派在串連，反砸三旧派也在串連。串連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連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講串連一下可以，实际在串連。你不讓好人串連，坏人在串連，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的。

江青：通过串連把观点统一起来就好，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进来就大哭。主席站起来上前握手，江青同志笑了。蒯一边哭一边告状，說清华告急，黑手操縱工人进清华镇压学生，是大阴谋。）

主席：你叫黄作珍，那里人？

作珍：江西×都人。

主席：老表嘛，久聞大名。黄作珍同志講話不算数，謝富治同志講話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曉得我們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文元：伸出紅手，宣傳毛澤东思想，我們都紧跟。

主席：四个办法，是那四种？

文元：軍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主席：一是軍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斗批走，你們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

总理：去年开始。

主席：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給你們大打，象四川一样。

江青：敗家子。

主席：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綫电。

江青……

主席：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傳。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圍消灭，反革命嘛！

江青：广西圍了快两个月了。

总理：你們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偉大战略部署？說关心国家大事，你們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主席：他們忙啊！

总理：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主席：不要分派了。

江青：希望你們团結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張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澤东思想派！

主席：不要搞兩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兩派？困难是有的。

××：教改搞不上去。

主席：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們也搞不上去，何况你們。这是旧制度害了你們，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們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會議上着急。我說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嘛。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講的，我还不是从逍遙派那里得点消息！馬克思搞哲学研究……他的一本什么書，他的《資本論》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你說創造党就这么容易。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是馬克思主义，一个是普魯

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一个拉萨尔……，布朗基的所谓报告，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

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要紧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文元：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主席：地球一轉一年，十轉十年，兩派这样下去，我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讓他們大打。空出地盤來，讓人家寫小說的去自修。學文學的你要寫詩，寫劇本；學哲學的你給我搞家史、廠史，寫革命的過程；學政治經濟學的不能學北大教授，北大有什麼出名的教授？這些東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這是個害人的辦法。組織個小組，自己讀書，自修大學，來來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試。考試不是辦法，一本書考十題，一本書一百個觀點，不只是十分之一嗎？就考對了，對其它90%怎麼辦呢？

誰考馬克思？誰考恩格斯？誰考列寧？誰考林彪同志？誰考黃作珍同志？羣眾需要，蔣介石當教員。我們都是這樣。中學要教師，但要刪繁就簡。

文元：办好几个圖書館。

主席：讓工农兵都有時間去，到圖書館讀書是個好辦法。我在湖南圖書館讀了半年，在北大圖書館讀了半年，自己選擇圖書，誰教啊？我只上了一門新聞學，新聞班算我一個。那個哲學研究會，辦哲學研究會的，沒有誠意，胡適簽的名，還有譚平山、陳公博。

大學辦得那麼死，這個大學應該比較自由一些。

江青：現在是搞武斗。

主席：武斗有兩個好處：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戰經驗；第二個好處是暴露了壞人。對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會現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現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來，再斗十年，地球照樣轉動，天也不會掉下來。

江青：我們真痛心你們，瞎說什麼不要大學生啦，我們是要你們的，你們有的有時還聽我們一些，有的聽，有的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你們後頭的東西我們也搞不清。

主席：背後不聽，我們這裡有個辦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無產階級去干涉。

（聶元梓要求派解放軍去北大）

主席：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軍，別的你又不想要。三十八軍可以不可以？如果井崗山三十八軍真支持，我就給你派六十三軍。你應該去作三十八軍的工作。

江青：聶元梓應該去作三十八軍的工作，你們歡迎三十八軍行不行？

主席：去一半三十八軍，一半六十三軍。三十八軍不象你們講的那麼壞，根子在楊成武和北京軍區。北京軍區開了兩個會，第一個會不太好，第二個會就比較好，鄭維山作了檢討。

譚厚蘭，其實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聶元梓身上，你譚厚蘭這麼女將轟了一炮，鄭維山夠緊張的。鄭維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解決問題去了，我們不是沒見他嗎？各軍都不知道這個軍長是好是壞，把將軍們都吓壞了。他找你（指譚）的麻煩沒有？

譚厚蘭：沒有，同學對他有意見。

主席：過去是有歷史原因，有點歷史，這些事情不是偶

然的，不是突然其来的。

伯达：紧跟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主席：不要讲什么教导。

文元：主席今天语重心长。

伯达：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点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主席：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骑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青：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主席：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腫病。

伯达：你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八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主席：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伯达：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总：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主席：不要说承认错误。

伯达：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主席：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总理：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总：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

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主席：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

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失了街亭，打了败仗。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郃剩了个马。……

叶群：那是失街亭。

林总：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

主席：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富治：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总：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主席：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富治：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

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生：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富治：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伯达：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爱晶：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伯达：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主席：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青：韩爱晶，我批评了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

主席：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青：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主席：年青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象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青：蒯大富有点笑傻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

（蒯报告：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

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大富：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主席：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家饴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

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明明知道宣传这么多嘛，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象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元梓：王、关、戚插了一手。

主席：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

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井冈山。

文元、富治：革命的井冈山！

江青：不要把我搞得爱莫能助。

主席：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总理：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大富：有。

主席：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总理：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主席：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武斗这么多天，工人敲锣打鼓来，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大多数学生，脱离你们自己人。说你的坏话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德：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主席：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江青：四·一四是骂我的。

主席：他们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头头）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主席：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我不能当，当不了。

主席：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

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江青：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

主席：第一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

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方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

谭厚兰：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主席：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中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走的。

江青：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主席：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林彪同志刚才不是讲了嘛！他的学问那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军校学来的？黄永胜同志学了一年半，温玉成学了三年还是幸福，温玉成，你是长岗人，也就认得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槽里怎么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他们两个比高尔基明得多，高尔基两年小学。我也没有读过什么大学。学家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发明蒸汽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读了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

子讀历史，不懂得階級斗争。

江青：讀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書都成了參考資料，輔助材料，他們老師的書才是正式教材。

主席：小学六年太長，中学六年太長，荒廢无度。不要考試，考試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試一概廢除，搞个絕對化，誰考馬、恩、列、斯，誰考林彪同志，誰考我？謝富治同志，把他們統統都招回來，統統回學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強，把四·一四留在學校里，井崗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井崗山統統到人大會堂來。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区别，分別对待。

韓爱晶：主席，我問一个問題。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內战來，你也說是毛澤东思想，我也說是毛澤东思想，出現了割据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主席：出了也沒啥大事嘛！一百多年來，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蔣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黨內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張國燾，什么高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經驗比馬克思还好。

林总：有毛澤东思想。

主席：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比沒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証……但我們保証要好一些，对于在座的跟林副主席走，把他弄淨。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我、林彪、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灭不掉。总不能把中国人民全灭掉，不能。卓，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成昭剛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媽，就不干了。晶元梓，以她的哥哥、妹妹不好來

攻她，你那个姐姐晶元素我不清楚，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妹妹联系起来呢？

总理：我的弟弟周永受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

主席：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現在也得坐噴气式。

林总：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主席：我自己也不高明，讀了那个就信那个，以后又讀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讀半年資本主义，至于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馬克思，只知道拿破倫、华盛顿。在圖書館讀書实在比上課好，一个燒餅就行了，圖書館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伯达：韓爱晶过去就是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有毛澤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主席：不能保証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講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講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文：这个问题，主席已經講过了。

总理 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學得好，包括苏联在內对馬、列著作都掌握好，林付主席掌握了。

主席 黨內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了？黨內出了李立三、王明路綫那么長，李立三又犯錯誤，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軍隊是跟着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綫那么長，还不是……。張聞天当了十年，也不高明。解放后又多少次？你这个人就是沒經驗。你們。你們問起我，我答了，不要以為我們這不起。有我們这些人在行，不。就天塌下来了，不信。

江青：韓愛晶給我寫幾次信，講這個問題，韓愛晶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一是脫離工農，二是脫離實際，一到我跟前就想將來，總說幾十年以後的事。還問我第三次世界大戰什麼時候打？

主席：想得遠好。這個人好啊！這個人好啊！我們有幾種死法：一是炸彈炸死，二是病死，被細菌鑽死，三是被火車、飛機砸死，四是我又愛游泳，被水淹死，無非如此。最後一種是壽終正寢，還是細菌么！

聽說劉少奇也救活了，劉少奇、薄一波幾乎死了，得了腎炎、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四種病。四、五個醫生救，兩個護士才救過來，脫離危險期了，你們聽說了嗎？

文元：歷史發展規律總是前進的，曲折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澤東思想，相信羣眾。我批評韓愛晶是悲觀主義。

韓愛晶：一次總不能勝利，肯定有曲折，按辯證法。

主席：一次前進是沒有的，歷史前進總是曲折的。一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勝利了以後，又出現蔣黨聯盟，廬山會議後彭德懷，現在走資派。

象蒯大富那個“徹底砸爛舊清華”，~~徹底砸爛舊清華~~也，四·一四說教員也有好的，可你老蒯說的徹底砸爛不砸爛好人，而是一小撮壞人。你把含義講清楚，他就不倒了。

趕快把領~~來~~集中起來，你們今天開個會，明天再開會。

江青：你那個樣子，~~你那個樣子~~，對你也是個緩慢。（~~你那個樣子~~，~~你那個樣子~~走了，江青把~~你那個樣子~~，~~你那個樣子~~走了。）

毛澤東思想萬歲



00302